

被衝撞的廣州體制？ ——重估清代中法交往和貿易的濫觴

周穎菁*

一、引言

至高無上、偉大的王子，願 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顯尊榮。獲知在陛下身邊與國度中有眾多飽學之士傾力投入歐洲科學，我們在多年前決定派送我們的子民，六位數學家，以為陛下帶來我們巴黎城內著名的皇家科學院中最新奇的科學和天文觀察新知。但海路之遙不僅分隔您我兩國，亦充滿意外與危險。因此為了滿足陛下，我們計畫派送同樣是耶穌會士，即我們的數學家們，以及敘利伯爵，以最短與較不具危險的陸路途徑以便能率先抵達您身邊，做為我們崇敬與友誼之表徵，且待最忠誠見證者敘利返回之際能發表您一生非凡的作為。為此，願 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顯尊榮。¹

這是 1688 年 8 月 7 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 寫給康熙皇帝 (1654–1722) 的信，此信被認為是反映當時最富盛名的東、西方兩大君王的積極往來，即便它並未如願送達康熙皇帝的手中。² 從該信內容來看，路易十四似欲以傳教士作為橋樑、科學作為手段來與中國宮廷建立官方往來。這些傳教士的確為當時的康熙宮廷帶來了豐富的科學活動，但實際上卻非路易十四或法國宮廷

本文是香港承訓堂資助的「清代港口貿易及物質文化研究 (第一期)」(Port Trade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Phase I]) 項目的成果。

* 周穎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博士後研究員

¹ 此封書信的手稿複製品藏於法國外交部檔案處，並曾於臺北故宮的「中法藝術文化特展」中展出。中文翻譯出自該展圖錄，見臺北故宮博物院：《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11 年)，頁 120。

² 同上注。

所促成，且他們甚至對與清廷往來多有疑慮而處於被動。中國官方檔案則對學者常論的兩位君王的「神交」鮮有記載，看來雙方宮廷都幾乎無意建設正式的外交關係，此尤其反映在首次中法貿易的成形中，其過程曲折且充滿戲劇性。此貿易所促成的中法關係開局實有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的大膽出擊和主導，特別是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更進一步操作出康熙皇帝和太陽王路易十四禮物交換的精彩戲碼，同時成就了法國商船 L'Amphitrite (海后號) 首航來華貿易，並以此挑戰清廷剛建立起來的「廣州體制」和海洋政策。中法此次貿易牽涉到羅馬教廷、法國宮廷、歐洲各修會、法國商人、法國東印度公司、清宮和廣東地方大員等群體之間的複雜角力。

二、「國王數學家」為何到來：中、法宮廷初會

1698年10月5日上午七點左右一艘法國船艦抵達廣東外海的上川島，³這艘船名為“L'Amphitrite”，其名是希臘神話中的海洋女神，也是海神波賽頓(Poseidon)的妻子，⁴因此本文將以「海后號」稱之。⁵它是第一艘法國直航中國的船隻，這艘500噸級的船上搭載了150人，並裝備30門船炮。⁶船上的人員除了水手外，還包括11位法國耶穌會士、15位儒丹公司(Société de Jourdan)的人員、2位法國東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的監督辦事員和11位法國皇家海軍人員。⁷這樣的人員組成頗耐人尋味，與當時來到中國的歐洲船隻有所不同，使人不得不好奇「海后號」的性質和來華意圖，此確實也讓當時的廣東官員和康熙皇帝感到困惑，致該船史無前例地停留在廣州長達15個月，方於1700年1月26日下午兩點左右離開廣州返航法國。⁸

³ Saxe Bannister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1698–1700*, by François Froger (London: T. Cautley, 185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1. (筆者按：文中引用均為Saxe Bannister之譯本，將以“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形式引用該文獻。)

⁴ Luke Roman and Monica Roman, *Encyclopedia of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p. 58.

⁵ 多數文章以音譯「安菲特利特號」、「安菲特里忒號」、或「昂菲特里蒂號」稱呼該船，少數則以意譯「海后號」稱之。本文選擇後者以呼應其名作為海洋的女性化身之意。

⁶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

⁷ Ibid., pp. 1–2.

⁸ Ibid., p. 152.

「海后號」搭載的人員中，官方、民間、宗教、商業人士皆有，但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白晉這位中國傳教史上和康熙宮廷中的明星人物，⁹他聲稱這艘首航中國的法國船艦帶來了路易十四要送給康熙皇帝的禮物，且它是搭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法王特使團的皇家軍艦。¹⁰這理當是一項重大外交行動，且白晉當時是以康熙皇帝的欽差身份從法國回到中國，並以此身份與廣東官員交涉，然中國文獻卻對此事幾無描述，即便是以不重外事記載的清代官方檔案而論，¹¹亦不免令人費解。另一方面，傳教士書信、法國商業檔案和歐洲報章雜誌等西文材料均對「海后號」在廣州的活動和其來華的前因後果多有描述，尤為引人入勝的是，白晉如何周旋於法國宮廷、法國商人、廣東封疆大吏和康熙宮廷等各群體之間，意圖將該船塑造成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國王御船」。「海后號」真是法王遣派至中國的船隻嗎？法國為何遣船來華及其船員組合何以呈此樣貌？白晉於其中的操作有否成效？以及中國方面未對此多做記述的原因又何在？這些問題都需從法國宮廷首次與中國的接觸論起，即本文起首引用的那封三百多年前康熙皇帝未能收到的法王書信，它的背景是「海后號」啟航中國的關鍵原因，中法政府首次往來和該艘首航中國的法船實為連續事件，兩者不僅互為因果，且主要參與者皆為同一批人物。

（一）路易十四在東方經營伊始的受挫

在信中可見，早在書寫該信的三年多前，路易十四已於1685年3月3日派遣六位「數學家」前往中國，他們是第一批入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分別是洪若 (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¹²白晉、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李明

⁹ 關於白晉和其思想的研究頗豐，參柯蘭霓 (Claudia von Collani) 著，李岩譯：《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黎子鵬編注：《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

¹⁰ 白晉：〈耶穌會傳教士白晉神父致國王懺悔師、本會可敬的拉雪茲神父的信（1699年11月30日於北京）〉，收入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147–48。

¹¹ 傳教士在華的官方活動之記載，參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¹² 幾乎所有出版物都將該傳教士譯為「洪若翰」，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於其畫琺瑯專書論道，根據中國自然科學院韓琦教授的研究，其正確譯名應為〔下轉頁76〕

(Louis le Comte, 1655–1728)、劉應 (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 和 Guy Tachard (1651–1712)。¹³ 既已派出這批耶穌會士，且他們已於 1687 年 7 月 23 日順利抵達寧波，¹⁴ 路易十四又為何要於 1688 年，再派一批數學家耶穌會士去中國？這似乎與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的另一封呼籲更多傳教士來華的書信有關。¹⁵ 洪若在他們滯留寧波時寫信給在北京的南懷仁，向他求助並傳達傳教士抵達中國一事。¹⁶ 南懷仁因此得知只有五位耶穌會士來華，¹⁷ 故於 1687 年 10 月 1 日致信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拉雪茲 (François d'Aix de La Chaise/Père Lachaise, 1624–1709)，¹⁸ 希望能有更多傳教士前來中國，並建議取道陸路東行，因為海路所費時間長且危險性更高，又陸路交通可讓傳教士於沿途開發新的傳教基地。¹⁹ 路易十四或因此而再派遣四位傳教士，欲走中亞—俄羅斯—中國路

〔上接頁 75〕

「洪若」。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年），頁 224。另，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柔遠特典》，是清廷對這批法國耶穌會士來華的書信議論，其中便以「洪若」稱之；詳參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 (Adrianus Dudink)、蒙曦 (Nathalie Monnet) 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 年），冊 16，頁 377–88。

¹³ 李明 (Louis le Comte) 著，郭強等譯：《中國近事報道 (1687–169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頁 21–22。

¹⁴ 博西耶爾夫人 (Yves de Thomaz de Bossière) 著，辛岩譯：《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8。

¹⁵ 南懷仁在此前 1678 年已寫過一封信給歐洲耶穌會，呼籲派更多傳教士來華。此信為法國派遣這批「國王的數學家」至中國的因素之一，下將論述。

¹⁶ 當時的浙江巡撫金鉉（活動於十七世紀晚期）對這些來到寧波的法蘭西傳教士不甚友善，將他們「當作犯人來對待」。博西耶爾夫人著：《耶穌會士張誠》，頁 8。

¹⁷ Guy Tachard 和李明在來華途中經停暹羅時，被暹羅國王那萊王（拉瑪鐵菩提三世，1629–1688）留下，但李明在暹羅停留一段時間後，仍同其他四位傳教士從該地出發前往中國，故只有 Guy Tachard 未入華。參李明：《中國近事報道》，頁 21–24。

¹⁸ 拉雪茲也是耶穌會士，並為錢幣學家和收藏家。他從 1675 年起擔任路易十四的告解神父直到去世為止，長達 34 年。故他對法王和法國宮廷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許多在中國的耶穌會士都與他有密切的通信往來。關於拉雪茲神父的生平和事跡，參 François Régis de Chantelauze, *Le Père de la Chaize, confesseur de Louis XIV: 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Lyon: Brun, 1859); Georges Guitton, *Le Père de la Chaize, confesseur de Louis XIV* (Paris: Beauchesne, 1959)。

¹⁹ 這封信的詳細內容，見 Henri Josson and Léopold Willaert, eds.,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23–1688),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Bruxelles: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1938), pp. 537–41。

線入華，然因莫斯科宮廷認為耶穌會士在1689年界定中俄邊界的《尼布楚條約》談判中偏袒清廷，而拒絕讓這些法國耶穌會士借道，²⁰故使他們受挫折返，²¹路易十四寫給康熙皇帝的這封信也因此被帶回法國，未能送達。

由此看來，路易十四幾次派出耶穌會士前來中國，似乎對與清宮建立往來或探索遠東相當熱切。然這僅為表象，他確實對中國好奇，亦對其物產表現出一定的興趣，但未如多數論述所強調的狂熱或主動。²²路易十四和其宮廷在行動上並不積極，不太願意花費資源在探索、經營遠東，因為他的重心仍在稱霸歐洲，故他於遠東地區的活動多是為其在歐陸的擴張所作出的反應和延伸，這些都具體地呈現在第一批法國耶穌會士和其後第一艘法船「海后號」的成行緣由和過程中。

這批「國王的數學家」的入華經過和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已有許多研究論述，²³其非本文論述重點故不再贅述，此處主論法國宮廷緣何起心動念派遣他們來華，以觀察法國官方對此的態度。前面提到南懷仁在洪若等抵達中國後，致信法國宮廷希望再派更多法國耶穌會士來華。實際上他早在約十年前1678年8月15日即以耶穌會中國副省(Vice Province of China)會長的身份，²⁴寫了一封著名的長信

²⁰ Joseph Sebes,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61).

²¹ 這次法國的派遣團中，只有薄賢士(Antoine de Beaulieu, 1657–1708)輾轉於1689年11月搭乘一艘英國船抵達廣州，並於1706年6月30日首次進入北京。他在同年10月被康熙皇帝派遣出使羅馬教廷，討論中國禮儀問題，但他所搭乘的船隻於1708年在接近葡萄牙海岸的洋面失事，薄賢士因此遇難。榮振華(S. J. Joseph Dehergne)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66–68；魏若望(John W. Witek)撰，辛岩譯：〈消除誤解：薄賢士和他的《中國禮儀之爭問題的說明》〉，《國際漢學》2011年第1期，頁185–206。

²² 嵇若昕已有提到路易十四本人其實並未特別喜愛中國瓷器，其家族中真正的瓷器收藏者為他的弟弟奧爾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 1640–1701)。見嵇若昕：〈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會〉，收入《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頁294。

²³ 有關這幾位數學家傳教士的研究和相關文獻汗牛充棟，參Florence C. Hsia, *Sojourners in a Strange Land: Jesuits and Their Scientific Miss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Catherine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17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博西耶爾夫人：《耶穌會士張誠》；李明：《中國近事報道》。

²⁴ 南懷仁於1676–1680年擔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此為在華耶穌會的首長。見王冰：《勤敏之士——南懷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28。耶穌會按地區將〔下轉頁78〕

致歐洲耶穌會全體，心焦地呼籲中國的傳教事業急需物資和人員前來拯救。其說道在中國的傳教士人數日漸減少，許多傳教士都已去世，且其餘還健在者亦都年歲已高，南懷仁自己寫這封信時也已56歲，所以強烈要求修會盡快安排更多人員前來迫切需要人力支援的中國。²⁵他還在信中強調派來中國的傳教士需要具備天文專業和受過完整的數學教育，因為這是在康熙宮廷服務及和中國士人往來的必要條件。這封拉丁文的呼籲信在1680年送達歐洲後引起很大的迴響，並在隔年被節選翻譯成法文刊登在《風雅信使》(*Mercure Galant*)的九月號刊。²⁶這本法國刊物是世界上最早的藝文期刊，且因享有法國王室的特許而帶有些許公報性質，在法國廣受歡迎，並在當時的歐洲很有影響力。²⁷這使得南懷仁的呼籲在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受到廣泛地響應，²⁸拉雪茲神父即適時向路易十四呈上此信，勸說國王派遣法國耶穌會士前往中國來突破葡萄牙在遠東的保教權(*patronatus missionum*)，並得以強化王權支持下的法國教會對抗羅馬教廷的力量。²⁹路易十四的寵臣、財政和海軍大臣科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亦大力建議國王趁機發展在遠東的商業利益和進行知識考察。³⁰

〔上接頁 77〕

全世界分為幾個參贊區(assistancy)，每一參贊區依其各自發展程度再劃分若干省(province)和副省(vice province)。關於耶穌會的組織結構，參鄭聖沖：《天主教耶穌會》(臺中：光啟出版社，1962年)；Dauril Alden, *The Making of an Enterprise: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Portugal, Its Empire, and Beyond, 1540–17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²⁵ Josson and Willaert,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pp. 230–53.

²⁶ “Extrait d’une Lettre tres-curieuse écrite de la Chine,” *Mercure Galant* (Septembre 1681): 194–211.

²⁷ Deborah Steinberger, “Le *Mercure Galant* and Its Student Body: Donneau de Visé’s Inclusive Pedagogy,” *Cahiers du Dix-Septième* 17 (2016): 41–56.

²⁸ 這封呼籲信在1682年被全文翻譯成法文出版，洪若在他寫給南懷仁的信中說，他便是受到感召而安排出版和印刷該信的拉丁文原文和法文版。見Noël Golvers,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1688) and the Chinese Heave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stronomical Corpus, Its Diffusion and Reception in the European Republic of Letter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5.

²⁹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pp. 104–5.

³⁰ 科爾貝是路易十四時期的名臣，他積極建立和發展法國的工商業，並以高關稅和嚴格的進口政策來保護國內的產業，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他的重商政策被稱為科爾貝主義(Colbertism)。他為強化法國經貿和產業建立了許多機構和組織，包括

〔下轉頁 79〕

但是路易十四仍未下定決心採取行動，此或與先前法國介入葡萄牙和羅馬教廷間的保教權之爭，³¹欲從中得利卻未能實現有關。而法國耶穌會和擁護保教權的葡籍耶穌會的鬥爭，自1680年代法王所派的第一批法國耶穌會士入華後，也不斷在中國和清宮中上演。從十七世紀初開始，「葡萄牙的亞洲」(Portuguese Asia)受到荷蘭和英國海權的挑戰而衰弱，³²使葡萄牙漸無力承擔前往中國的傳教士的經費，這阻礙了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在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逝後於1610至1654年接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的意大利耶穌會士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即在他任職的當年1610年11月23日寫信給耶穌會羅馬總會長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反應在華傳教士的困境：「我們正在借貸度日，因為已有兩年沒有船隻從印度開來，尤其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同時也是葡萄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以往每年給我們的補助金也停止了。」³³

羅馬教廷便欲擺脫其保教權——前往遠東的各修會和各國的傳教士須有葡王的批准、向葡王效忠及維護其利益、乘葡萄牙船隻從里斯本出發、並享葡王的資助和保護——在東方的宗教和相關利益的壟斷，故於1622年成立「傳信部」

〔上接頁78〕

法國東印度公司和皇家科學院都是他所創建。科爾貝一直希望能在亞洲建立法國的殖民勢力，來抵抗荷蘭和英國在該地區的強大影響力。參Arthur John Sargent, *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899); Glenn Joseph Ames, "Colbert's Indian Ocean Strategy of 1664–1674: S Reappraisal,"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3 (1990): 536–59.

³¹ 地理大發現早期的十五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為兩大海權國家爭奪全球殖民地。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 1431–1503)調停兩國紛爭而使其於1494年簽訂《托德西利亞斯條約》保教權，劃分「教皇子午線」，該線以西為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以東則為葡萄牙。由於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24)開拓從里斯本繞好望角到印度洋的航線，教宗利奧十世(Pope Leo X, 1475–1521)於1514年再度將亞洲的保教權授與葡萄牙。見John Horace Parry,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1450–1650* (London: Cardinal, 1973), p. 194, 202.

³² 陳明鈺：〈中國與葡萄牙全球化交往之「澳門因素」五百年回顧〉，收入陳明鈺等編：《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33–35。

³³ 見龍華民撰，羅漁譯：〈龍華民神父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收入劉俊餘等譯：《利瑪竇全集》(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冊4，頁543。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在1662年寫於福州的信中亦稱，他們已有三年沒從其基本生活資源的來源地澳門得到資金支持了。見高華士(Noël Golvers)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頁587。

(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現為「萬民福音部」)來直接管理海外傳教事務；並進一步在1659年於傳信部設立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職位，在遠東建立六個代牧區，其中三個管理中國地區，由教宗指派代牧，要從葡國手中奪回在東方傳教的統治權。³⁴

在這兩者的衝突中，法國起初基於自身利益支持羅馬教廷，法國耶穌會士羅歷山(Alexandre de Rhode, 1593–1660)以其在越南和澳門的傳教經歷，³⁵更讓教廷意識到葡萄牙的頹勢已危及天主教的遠東勢力，並主張路易十四的法國是能在該區抗衡新教的荷、英的最佳選擇。³⁶羅歷山因此也鼓吹法國應趁勢展開在遠東的經營，並於返歐後的1653年獲得路易十四的召見，³⁷他是首位提出在傳教的同時進行法國在東方的探索的傳教士。³⁸教廷傳信部因而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批准巴黎外方傳教會(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縮寫MEP)這瞄準亞洲地區、第一個非依賴葡萄牙或西班牙這兩個傳統修會和殖民勢力、及全體成員都是法國人的新傳教組織，³⁹並任命該組織的三位法籍會士為中國區域的代牧：陸方濟(François Pallu, 1626–1684)為東京(Tonkin)宗座代牧，管理中國雲南、

³⁴ 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Paul Guethner, 1932), pp. 44–48.

³⁵ 羅歷山將自身在遠東35年的傳教經歷和旅途見聞於1653年在巴黎首次出版，Alexandre de Rhode,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 (Paris: Julien, Lanier et Cie, 1854)；英文版見：Alexandre de Rhode, Solange Hertz trans., *Rhodes of Viet Nam: The Travels and Missions of Father Alexander de Rhodes in China and Other Kingdoms of the Orient* (Maryland: Newman Press, 1966).

³⁶ 羅歷山於1645年12月20日從澳門啟程回羅馬述職時，他的上級讓他選擇搭乘荷蘭船隻回歐洲而非葡船，因其到里斯本的發船間隔太長了；加上他於1646年回程時因傳教在巴達維亞(荷屬)被囚數月，使他深刻見證了葡萄牙在亞洲的衰敗。參Hertz, *Rhodes of Viet Nam*, pp. 340–43.

³⁷ Hertz, *Rhodes of Viet Nam*, p. 435.

³⁸ Ibid., pp. 435–36. 關於羅歷山在越南和澳門傳教活動的研究，見Peter C. Phan, *Mission and Catechesis: Alexandre de Rhodes and Incultur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8)；蘇一揚(Ivo Carneiro de Sousa)著，張廷茂譯：〈耶穌會士羅歷山：第一個在澳門的法國人〉，《文化雜誌》第93期(2014年冬季刊)，頁82–102。

³⁹ Catherine Marin,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350 ans à la rencontre de l'Asie 1658–2008* (Paris: Karthala, 2010), p. 3.

貴州、湖廣、四川、廣西五省及寮國的教務；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 (1624–1679) 為交趾(Cochinchina)宗座代牧，管理浙江、福建、兩廣、海南；Ignace Cotelendi (1630–1662) 為南京(Nanking)宗座代牧，管理中國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朝鮮。⁴⁰要利用法國的力量來收回葡萄牙的保教權。路易十四「在得知教廷使用法國傳教士，並已派出主教去東方的消息時，感到尤為滿意，國王陛下很高興教廷在其臣民中挑選。根據許諾，國王賜給每名代牧 1,000 法鎊(livre)的年金，以後將增加到 3,000 法鎊」⁴¹。相當於每名代牧二百兩白銀的年金，並會增至每年六百兩。⁴²法王對羅馬教廷的宗座代牧如此大方，顯是欲趁此鷸蚌相爭的局面得利，期待三位法籍代牧在遠東為法國的利益服務。但是當這些代牧在 1677 年遵照教宗頒布的諭旨，向羅馬教廷宣誓：

教宗對所有土地上的宗教行為擁有最高和絕對獨立的權力，不需要得到任何教徒或非教徒的允許，無論此人具有任何地位和級別，即便是國王也不例外。……特別是到中國、安南、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和附近其他地區去傳道。⁴³

⁴⁰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

⁴¹ “la satisfaction particulière éprouvée par le Roi en apprenant que le Saint-Siège veut bien employer des ecclésiastiques françois à la conversion des Infidèles dans les royaumes de l’Orient et que, y ayant envoyé des évêques, c’est parmi les sujets de Sa Majesté qu’il lui a plu de les choisir. Suivant sa promesse, le roi accorda à chacun des vicaires apostoliques une rente viagère de 1.000 livres, qu’il portera par la suite à 3.000 livres.”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pp. 36–37. 陸方濟在 1670 年致信路易十四，感謝他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提供資金，參 Adrien Launay and Frédéric Mantienne, eds., *Lettres de Monseigneur Pallu: Ecrites de 1654 à 1684* (Paris: Les Indes savants, 2008), p.18.

⁴² 法國耶穌會士利國安(Giovanni Laureati, 1666–1727)在 1714 年 6 月 26 日寫於福建的書信中提到：「一兩白銀相當於我們 5 利弗爾(livre)的價值。」見杜赫德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頁 118。

⁴³ “Le Souverain Pontife ayant une puissance suprême et absolument indépendante pour la conduite spirituelle des âmes dans toute la terre et la permission ny le consentement d’aucun fidèle ou infidèle de quelque estat et dignité qu’il soit sans excepter même les rois, ne luy estant nullement nécessaire pour envoyer des ouvriers qui preschent, annoncent, établissent et avancent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t la foy catholique parmi les Infidèles et notamment dans la Chine, le Tonquin, la Cochinchine, Cambodge, Siam et dans les autres provinces voisines . . .” Se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p. 48.

路易十四自然極為不滿，認為該誓詞破壞了他最初對巴黎外方傳教會和法籍宗座代牧的信任，所以當傳教會創始人、也是三位中國宗座代牧之一的陸方濟在1680年返法時，法王便拒絕召見他。⁴⁴路易十四必然從此覺察到這些代牧雖為法國人，但他們優先服從羅馬教廷而非自己的王權，⁴⁵所以未必會照顧到法國的利益。因此當南懷仁那封鼓吹傳教士來華的呼籲信在1680年觸動歐洲天主教、又於之後兩年在法國和其宮廷發酵時，路易十四不為所動、未被其廷臣所勸服，可能即受此影響，懷疑這些傳教士即便是法國臣民出身和受法國宮廷資助，亦不一定會為國王服務或承做其所交辦的差使，畢竟他才剛失意於巴黎外方傳教會；且路易十四與當時的教宗英諾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 1611–1689)亦因世俗王權和教廷權威之爭及對新教徒的政策相左等問題而關係齟齬，⁴⁶自然擔心重蹈覆轍而再為人作嫁。

(二) 法國與東方接觸的轉捩點：暹羅使團訪法

最終讓路易十四決定選派那六位耶穌會士前往中國的重要契機是1684年暹羅使團的訪法，⁴⁷這次成功的訪問讓他再見到經營遠東的機會，便趁著在隔年回派使團訪暹的同時運送這些傳教士去東方。暹羅當時正受到在東南亞擴展其勢力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侵擾，⁴⁸暹羅國王那萊王(King Narai the Great, 1629–1688)從駐

⁴⁴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p. 49.

⁴⁵ 巴黎外方傳教會是由世俗神父組成的團體，所以宗座代牧是具有主教特權的世俗教士，主要效忠於羅馬教廷。因為教廷的財政力量無法給予宗座代牧足夠的資助，故該傳教會的總部才設於巴黎。參郭麗娜、陳靜：〈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對天主教中國本土化的影響〉，《宗教學研究》2006年第4期，頁128–34。

⁴⁶ 教宗英諾森十一世於1679年12月29日寫給路易十四的一封信，非常生動地反映了兩者對於世俗王權在宗教事務上的爭執，參Catholic Church, *The Popes Threatning Letter to the French King*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Brome, 1681)；相關討論參H. G. Judge, “Church and State under Louis XIV,” *History* 45.155 (1960): 217–33; Louis O’Brien, “The Huguenot Policy of Louis XIV and Pope Innocent XI,”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7.1 (1931): 29–42.

⁴⁷ 暹羅已於1680年派出第一批訪法的使團，然其船Soleil d’Orient在好望角附近海域遇難。Michael Smithies, *Mission Made Impossible: The Second French Embassy to Siam 1687*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p. 8.

⁴⁸ 別爾津(Берзин)撰，陳遠峰譯：〈十七世紀下半葉法國殖民者在暹羅的活動〉，《東南亞資料研究》1963年第2期，頁69–78。

於此地的巴黎外方傳教會中得知，⁴⁹法、荷間的敵對及後來法荷戰爭 (Franco-Dutch War, 1672–1678) 法國勝利的結果，使他欲與法國結盟來對抗荷蘭人。那萊王的寵臣華爾康 (Constantine Phaulkon, 1647–1688) 更是這次法、暹結盟的關鍵推手，他本是受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希臘人，於 1678 年隨公司來到暹羅，並在學習泰語後成為那萊王的翻譯。⁵⁰華爾康以其會計和語言能力、及對歐洲情況和商貿的了解，受到那萊王的賞識和信任，甚而在當時的暹羅擔任相當於宰相的職位，並掌理國庫。⁵¹法國對荷蘭戰爭的勝利讓那萊王視路易十四為偶像，⁵²且華爾康認為法國對遠東地區的了解不如荷、英，更容易為他所左右而極力促成暹、法聯盟。他也同時要借助法國的力量來鞏固自己在暹羅宮廷的地位，華爾康作為外國人而相當受到暹羅本土官員和權貴的猜忌。⁵³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即評論說，這次暹羅使團的目的實為：

Constance (華爾康在法國被稱為 Constance Phaulkon) 企圖鞏固自身權位，進一步高升，需要外國援助，……他以他的主人暹羅國王的名義派遣了一個威嚴的使團，並攜帶厚禮前往覲見路易十四，以便使這位法國國王

⁴⁹ 前述那三位要前往中國代牧區的其中兩位代牧陸方濟和 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 在 1664 年於暹羅會合，欲從此入華，那萊王頗為賞識他們而准許其在暹羅建立神學院和醫院，這使巴黎外方傳教會決定以暹羅作為其遠東傳教的據點，以尋找機會進入中國。為實現此一目標，必須仰賴法國力量的支持，陸方濟於是在 1667 年回到法國後向路易十四上書一份遠東擴張的計劃書，包括在暹羅建立商站來打通前往中國的路線。法王對此計劃相當滿意，而在陸方濟 1670 年再赴暹羅時令他帶去給那萊王的書信。Adrien Launay, *Siam et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Tours: Alfred Mame et Fils, 1896), p. 71, 75. 因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暹羅所打好的關係，讓法國東印度公司在 1679 年派了三艘商船到暹羅，受到優厚的待遇，這也是 1680 年暹羅決定派遣使團前往巴黎的原因之一。參 Jules Sottas, *Une Escadre française aux Indes en 1690,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royale des Indes Orientales 1664–1719* (Paris: Plon-Nourrit et Cie, 1905), pp. 137–38.

⁵⁰ Walter J. Strach, “Constantine Phaulkon and Somdet Phra Narai: Dynamics of Court Politic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Siam”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2004), p.23.

⁵¹ Ibid., p. 9, 55.

⁵² Ibid., p. 80.

⁵³ Launay, *Siam et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p. 98.

知道，這個印度地區的國王對他的光榮十分敬佩，只願同法國一國締結商約，並且他自己並非不想皈依天主教。法國國王的赫赫威勢就這樣受到了奉承吹捧，他信仰的宗教就這樣受到欺哄蒙蔽。⁵⁴

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接見這一暹羅使團，法國宮廷得知能在暹羅建立通商口岸的這一條件，決定在1685年回派使團訪問暹羅，同時護送暹羅使團回國。法國東印度公司此時接近破產，正在進行改組，路易十四便欲以暹羅為基地與荷蘭進行東方貿易的競爭，⁵⁵來振興公司並對抗荷蘭的海上勢力。再者，路易十四對在亞洲傳播天主教亦抱有一定的熱誠，所以他在給法國回訪使團的指示中，甚至提到宗教問題超越貿易問題。⁵⁶故趁此次遣船往暹羅的機會，一併選送前往中國的傳教士，來回應這幾年不斷呼籲的拯救中國傳教事業的問題，但要求他們抵達暹羅後再自行尋找入華的途徑。

法國與暹羅建立往來固然是讓那六位耶穌會傳教士來華終能具體成行的重要推力，但同時還有其他若干情勢推波助瀾，打動路易十四去接觸中國。在暹羅使團抵達法國不久前，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在1684年9月15日於凡爾賽宮覲見路易十四，他受南懷仁所指派以中國副省代理人的身份於1681年12月從澳門返歐，要拜訪教廷和歐洲各宮廷，來招募人員來華、爭取財政支持和宣傳在中國的傳教團。⁵⁷柏應理在法國宮廷的引見是拉雪茲神父所安排，⁵⁸他重申南懷仁的呼籲並告訴國王「30多年前與羅歷山神父前往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士幾乎全都在傳教的工作中去世了，……所以中國地區急需

⁵⁴ 伏爾泰(Voltaire)著，吳模信等譯：《路易十四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79–80。

⁵⁵ Donald C. Wellington,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ies: 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Record of Trade* (Maryland: Hamilton Books, 2006), pp. 35–39.

⁵⁶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p. 71.

⁵⁷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254.

⁵⁸ 從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開始到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的兩百年間，法國國王的告解神父一職都是由耶穌會士所掌握，所以他們成為修會在宮廷的代言人，影響力龐大。參Henri Grégoire, *Histoire des confesseurs des empereurs, des rois et d'autres princes* (Paris: Baudouin Frères, 1824).

大量人手，來教導數量已成規模的信徒」⁵⁹。但這次觀見最引人注目的是隨柏應理來到歐洲的中國人沈福宗（葡萄牙名 Michel Alfonso, 1657–1692），他是來自南京的中國耶穌會士，為最早來到歐洲的中國人之一。此會見相當戲劇性，拉雪茲神父描述這位中國人的出現擄獲整個法國宮廷的視線，他身著龍紋青絲深藍錦緞服，以中國的叩頭禮問候路易十四，並在隔天的王宮晚宴上向國王示範筷子的用法。⁶⁰《風雅信使》在當年的九月號刊也報導了這次有趣的會面，⁶¹使柏應理和沈福宗成為巴黎的話題人物，⁶²為不久後法國耶穌會士團的派遣有相當的助益。

柏應理此行帶了許多中國物品，並在他和沈福宗參訪聖路易王宮（St. Louis House）時將其展示，⁶³引起多方關注，為歐洲的中國熱又掀起一波高潮。⁶⁴盧福瓦侯爵（François-Michel le Tellier, Marquis de Louvois, 1641–1691）在科爾貝逝後接任其職務，包括掌管法國皇家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並同樣支持向遠東擴張，來發展法國的商貿和科學、技術知識。因此他亦支持派耶穌會士入華，建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同時考察中國各面向，這批數學家傳教士即是由他所組織。⁶⁵盧福瓦讓科學院擬了一份35道關於中國各領域清單的問題，包括歷史、科學、動物、武器、建築、交通、紡織、瓷器、宗教、礦產、國家財政、

⁵⁹ “Il avoit appris du P. Couplet que presque tous les Jesuites François qui estoient allez à la Chine il y a plus de trente ans avec le Pere Alexandre de Rhodes, estoient morts en travaillant dans les Missions de ce Royaume, qu’il n’y restoit plus que fort peu de Missionnaires, . . . qu’enfin on y avoit un besoin extreme d’Ouvriers Evangéliques, tant pour cultiver les Chrétiens qui y font déjà en grand nombre que pour recueillir le fruit de espérances certaines qu’on a présentement plus que jamais d’étendre la Foy dans ce caste Empire.” See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 à la Chine* (Paris: Arnould Seneuze, 1686), p. 4.

⁶⁰ Chantelauze, *Le Père de la Chaize*, p. 53.

⁶¹ 陳國棟：〈雪爪留痕——十八世紀的訪歐華人〉，《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年），頁195。

⁶² Mungello, *Curious Land*, p. 255. 但接任南懷仁擔任中國副省會長的葡萄牙耶穌會士畢嘉（Jean-Dominique Gabiani, 1623–1696）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之後副省代理返歐時，不應帶印度或中國人同行。參 Theodore N. Foss,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1692,” in Jerome Heyndrickx, ed.,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0), pp. 121–42.

⁶³ Mungello, *Curious Land*, p. 255.

⁶⁴ 柏應理於1682年返歐後，帶著沈福宗展開比利時、意大利、法國、英國等地的巡遊。

⁶⁵ 藍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137。

地理、萬里長城等提問，原欲交給柏應理來請他回答，後來在確定耶穌會士得以成行後便轉發給他們。⁶⁶此外，科學院在科爾貝的大力推動下創立後，⁶⁷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即是改進地圖測繪技術來繪製世界地圖和修正法國輿圖。所以從1670年代起，科學院和皇家天文台台長卡西尼 (Jean-Dominique Cassini, 1625–1712) 便派出許多研究人員前往各地勘測，但當時中國嚴禁外人入境，故尋覓機會進入中國考察和實測是其想望已久的事，因此皇家科學院亦積極推動耶穌會士的派遣。⁶⁸

之所以要求選派耶穌會士，乃因耶穌會十分注重教育，其會士的培訓系統極為嚴謹：兩年的實習、九年的學術訓練和兩年以上的教學經歷，⁶⁹因此他們是能完成上述傳教、貿易、外交、科學等多重任務的最佳人員，故負責籌辦這次傳教士入華考察團的盧福瓦侯爵即「向我會(耶穌會)總會長索要能被他看中的若干博學的耶穌會士。」⁷⁰加之，南懷仁、柏應理和那些在中國活動的傳教士已不斷向歐洲傳達數學能力在中國和康熙宮廷的重要性，⁷¹《風雅信使》1682年四月號的一則載文便道：「若是缺乏數學知識，在中國將一事無成。奉派駐在中國的神父們深知此理，他們藉此獲得中國人的理解，然後輕而易舉地就可讓他們信奉上帝。」⁷²可見法國宮廷已明確接收該訊息，而數學更是耶穌會教育系統的強項科目。⁷³職此，第一位被法國宮廷和皇家科學院選出的耶穌會士為洪若，他是耶穌會龐大的教學機構中最富盛名的克萊蒙學校 (Collège de Clermont) 的數學教授，並擅長天文學。⁷⁴洪若擔任此次中國考察團的領隊，他依上述標準選出另外五位優秀的

⁶⁶ 藍莉：《請中國作證》，頁137。

⁶⁷ 見本文注30。

⁶⁸ Tachard, *Voyage de Siam*, pp.1–2.

⁶⁹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36–40.

⁷⁰ 藍莉：《請中國作證》，頁138。

⁷¹ Matthew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 Louis J. Gallagh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⁷² 藍莉：《請中國作證》，頁63。

⁷³ 克拉維 (Christopher Clavius, 1538–1612) 為耶穌會士和數學、天文學家，也是利瑪竇的老師。他將數學設為耶穌會的重要學科，主張世界各地耶穌會的成員都必須學習數學，因為他認為卓越的數學能力會贏得人們的尊重，且數學是理解自然和上帝的方式，引導人們走上信仰的道路。參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pp. 23–24.

⁷⁴ *Ibid.*, pp. 103–4.

耶穌會士。⁷⁵與他們同行前往暹羅的舒瓦西教士(François-Timoléon de Choisy, 1644–1724)便評論這批赴華的耶穌會士各個都是「南懷仁」，⁷⁶他對洪若的才能尤為讚賞說「有朝一日他會當上大官，成為中國皇帝的寵臣」。⁷⁷正因這幾位耶穌會士都是當代的傑出之士，法國宮廷中有不少聲音反對將他們派往遠東：「把他們留在原地，改派那些能力一般，但具有足夠的力量忍受傳教的辛勞、具有足夠的熱忱致力於異教徒的皈依的人，前往這些遙遠的國家不是更好嗎？」⁷⁸幸而他們仍是以「國王的數學家」(Mathématiciens du Roi)的身份成行，⁷⁹隨暹羅使團搭上「大鳥號」(l'Oyseau)前往遠東，才得以促成之後「海后號」來華和操作出精彩的中、法君王交往的大秀。

三、康熙皇帝的欽差：白晉在法國宮廷的斡旋

這些法國耶穌會士確實在中國大放異彩，他們各以其長而獲康熙皇帝的賞識，從此與清宮建立密切的關係。在1688年2月7日順利進入北京後，白晉和張誠被康熙皇帝留在宮廷服務，洪若、劉應和李明則得到同意可以到各省教區活動。其中白晉因與康熙皇帝相處的時間最長而與其最為親近。⁸⁰除了教授皇帝西學和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貢獻外，法國耶穌會士還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為皇帝治癒瘡疾，此著名醫案更是大大強化了法國耶穌會士在清宮的地位，使他們與康熙皇帝的關係益加密切而直接催生了中國派遣使節前往法國。康熙皇帝在川陝總督

⁷⁵ 在柏應理停留巴黎期間，洪若與他會面若干次，這些會面對該次法國耶穌會士的中國行的成行相當重要。洪若除了向他詢問中國的情況，應也討論赴華人選。見 Mungello, *Curious Land*, p. 256.

⁷⁶ 南懷仁的才幹和博學聞名歐洲宗教學界、中國士人圈、及清宮，最著名的代表事件之一為1664至1671間的「康熙曆獄」，詳見董少新：〈安文思、利類思、南懷仁致耶穌會諸神父，北京，1669年1月2日〉，《古今論衡》第28期(2015年)，頁144–62。

⁷⁷ 藍莉：《請中國作證》，頁64。

⁷⁸ 洪若：〈耶穌會傳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國王懺悔師、本會可敬的拉雪茲神父的信(1703年2月15日於舟山)〉，《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252。

⁷⁹ 路易十四賜予這些法國耶穌會士的稱號，不完全是因他們的科學能力，很大程度是為了避開葡萄牙的保教權。見 Catherine Jami, “Pékin au début de la dynastie Qing: capitale des savoirs impériaux et relai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5.2 (2008): 52.

⁸⁰ 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頁26。

佛倫(?-1701)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693年6月29日)的請安摺中自述：「朕自初八日始患汗病，十三日始瘧疾，隔一日來一次，甚重，二十七日瘧疾痊癒。朕體今大安了，好像舊病諸疾都已根除了。」⁸¹此即為廣為人知的法國耶穌會士進獻金雞納霜(cinchona)治癒康熙皇帝的瘧疾事件，⁸²但這些數學家們實則於其中經歷一些曲折和運氣。

康熙皇帝患病後太醫的診治不見效，便於6月13日召見意大利耶穌會士盧依道(Isidoro Lucci, 1661-1719)，他是當時康熙宮廷中唯一受過醫學訓練的傳教士。⁸³但當時盧依道手中並無合適的藥品可緩解皇帝的發熱病症，康熙皇帝對此答覆極不滿意；幾日後盧依道想起並向皇帝稟報金雞納霜是解熱的良藥，可能可以治療瘧疾，但北京沒有此藥，不過他確定澳門有。但康熙皇帝已不滿盧依道先前的「失察」，轉而向白晉和張誠求藥，他們似乎給了皇帝一種強效瀉藥，讓他症狀趨緩以為痊癒，但隔天又開始發熱。康熙皇帝怒責其藥無效，其他耶穌會士亦因此責難法國耶穌會士胡亂獻藥，置整個宣教事業於險境，這使法國耶穌會士陷入困境。⁸⁴峰迴路轉，此時洪若和劉應正好進京，並碰巧帶著先前盧依道所推薦的金雞納霜，成功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這兩位原在廣州的法國耶穌會士，在1693年2月5日接到康熙的諭旨令其進宮，⁸⁵且恰好帶來剛在廣州收到的、Charles François Dolu神父(1655-1740)從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éry)寄來的一斤金雞納霜，⁸⁶進而在宮裡似乎無法可施的關鍵時刻救治了皇帝。可以想見康熙

⁸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43。

⁸² 金雞納霜即奎寧，金雞納樹的樹皮磨成粉可以緩解燒熱、治療瘧疾。金雞納霜是耶穌會在1650年左右所發現，可能是得自秘魯印地安人，當地人服用它以解熱，耶穌會便亦用此來治療間歇性的發熱。耶穌會對金雞納霜進行貿易壟斷，秘魯的耶穌會士將金雞納樹皮運往歐洲，將其磨成粉販售得利，故它也被稱為「耶穌會樹皮」。參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4-15.

⁸³ 盧依道神父在康熙宮廷的服務時間短暫，他的離去跟這件瘧疾醫案直接相關。詳見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 "Isidoro Lucci S.J. (1661-1719) and João Baptista Lima (1659-1733) at the Qing Court: The Physician, the Barber-surgeon, and the Padroado's Interests in China,"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82.163 (2013): 165-216.

⁸⁴ Ibid., 191-94.

⁸⁵ Ibid., 199.

⁸⁶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287-90。此外，本地治理是當時法國在印度所建的亞洲商貿據點。

自然大為歡欣，隨即在癒後幾日的7月4日賞賜法國耶穌會士一棟在皇城內的房子（即之後的北堂），⁸⁷並在同一天任命白晉為欽差返回法國，帶來更多博學的耶穌會士和法國的良藥及配方。⁸⁸

（一）路易十四對白晉的疑慮

由此，法國和中國首次形成往而復來的來往。多數研究強調這是路易十四在遠東商貿、宗教、歐洲中國熱和政治利益的驅使，及康熙皇帝追求西方科學人才和知識，而促成兩位君王對彼此交往表現熱切，並將這些傳教士視作為雙方的代理人。然而，在這次欽差的任務中，白晉實為努力牽起與建立中法官方關係的主動者，而非被動傳達指令的使者，並膽大地對兩邊宮廷使出兩面手法，欲為法國在中國開拓出相異於其他國家的獨特交往模式，甚至不惜挑戰清廷對西洋往來中國的經略政策。他返法後採取各種方式和行動要促成如法國與暹羅一般的中法宮廷正式外交，⁸⁹雖然白晉未能達成最終目標，但他以兩手策略營造出類似的假象，並成功讓法國耶穌會團在1700年脫離葡萄牙中國副省而獨立，⁹⁰成為耶穌會在華的最大勢力。同時由此可見，即便這些數學家傳教士不負所托，贏得康熙皇帝的信任而在清宮和中國建立優勢地位，但路易十四和法國宮廷卻無意乘勝追擊，來與中國官方發展正式的外交關係。

1693年7月8日白晉以欽差的身份離京，於隔年1月10日在澳門搭乘一艘英國船返法，最終在1697年3月1日抵達法國布雷斯特港（Brest），並於5月1日到達巴黎。⁹¹他隨即展開一連串如火如荼的行動，要說服法國宮廷組織一正式使團和一批法國耶穌會士前往中國，如同他自己當年隨之離法的赴暹羅使團一般的法國官方代表和船隻。因此路易十四當然是他首要遊說的對象，白晉在覲見國王時呈上一份「中國皇帝派往法國的使節」報告，裡面說明中國皇帝任命他為欽差出

⁸⁷ 北堂之後便成為在華法國耶穌會士的居處，而原本的西堂和東堂則為保教權耶穌會士的所在。W. Devine, *The Four Churches of Peking*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0), pp. 239–46.

⁸⁸ Puente-Ballesteros, “Isidoro Lucci S.J. and João Baptista Lima,” p. 201.

⁸⁹ Joachim Bouvet, *Journal des voyages*, ed., Claudia von Collan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pp. 24–25.

⁹⁰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1665–1741)*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 pp. 109–10.

⁹¹ 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頁26–27。

使法國的目的並期待法王積極回應。⁹²白晉同時將這份報告於同年1697年在巴黎出版為《康熙皇帝傳》（或譯《中國皇帝的肖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⁹³其中大大地讚揚康熙皇帝的品格和才智，強調皇帝對他們這些法國傳教士是多麼地禮遇、又對太陽王是如此地景仰，所以希望有更多這樣優秀的人才來到中國，並聲稱康熙期盼法國船的到來，將會給予法王想要的所有貿易優待。白晉這般誇大其詞和大開支票都是為了要引發輿論及其發酵，來為他的遊說活動造勢，所以他也同時出版了《中國人物圖像》（或譯《中國現況圖像》，*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⁹⁴展示各種中國人物的服飾，這是他請法國宮廷版畫師Pierre Giffart (1643–1723) 以他從中國帶回的畫像所作，⁹⁵欲激起法國宮廷和巴黎對與中國交往的興趣。李明當時也已回到法國，似也參與白晉在法國宮廷的遊說活動；⁹⁶且他描述中國經歷的書信《中國近事報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也已於1696年在巴黎出版，此書在一經出版便引起轟動，而在4年間重版五次，並有英、意、德等譯本，⁹⁷由此可見，該書對此鼓吹派船赴華一事有頗大助力。

白晉的宣傳確實在巴黎宮廷引起相當大的轟動，他還刻意身著中國長袍，噱頭十足，讓法國再掀起一股中國風的熱潮。⁹⁸路易十四雖有所心動，願意再組一赴華耶穌會士團，⁹⁹但並未被這些宣傳攻勢所述惑來安排使團和船隻，因為白晉沒有帶來康熙皇帝的書信或相關文件。白晉回應中國皇帝只會對其附庸或藩屬下達這種標誌臣屬的「國書」，他自己有代表清帝國的欽差身份就已足夠。¹⁰⁰法國宮廷亦

⁹² Paul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Journal des Savants* (Décembre 1928): 449.

⁹³ 白晉著，趙晨譯：《康熙皇帝》（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⁹⁴ 白晉也將此書獻給路易十四和勃艮第公爵夫人 (Marie Adélaïde de Savoie, 1685–1712)，後者為路易十五之母。J. C. Gatty, *Voyage de Siam du Père Bouvet* (Leiden: Brill, 1936), p. LXXII. 法國國家圖書館有收藏一刊本，藏書號RES-O2N-31；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亦藏有一本。

⁹⁵ 關於該本圖像集的內容訊息，見李招瑩：〈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旅遊札記描繪中國人物肖像傳統——從中國叢刊《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791》插圖談起〉，《人社東華》第12期（2016）（電子季刊無頁碼）。

⁹⁶ Abel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vol. 2, p. 41.

⁹⁷ 李明：《中國近事報道》，頁7。

⁹⁸ Gatty, *Voyage de Siam*, p. LXXII.

⁹⁹ 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頁27。

¹⁰⁰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449–50.

懷疑他所宣稱的欽差身份，要求白晉出示其欽差證明，他又狡辯在離開中國時已歸還，因為這只頒賜給在中國的皇帝臣民，但他提供了一份冗長名單，裡面列有能證明他身份和所言非虛的中國人。¹⁰¹又、白晉應是為了返回中國時，能有更多籌碼可供他發揮和提高法國耶穌會在清廷的地位和威望，而強烈請求路易十四撰寫一份給康熙皇帝的國書，他宣稱提出貿易要求的國家需要先主動向中國皇帝呈遞國書，否則中國不會提供商貿服務。¹⁰²法國宮廷因此更為猶疑，不大相信中國皇帝會為此要求國書，認為這是白晉為耶穌會求取免費赴華交通的詭計。¹⁰³

白晉雖然帶來康熙皇帝送給路易十四的禮物，包括49冊中文和滿文書籍、瓷器、綢緞和人蔘等，¹⁰⁴但卻未呈送國書這類的文件，僅依賴白晉傳達口信，如同對待從屬一般。¹⁰⁵加上白晉的欽差身份又無法確認，故法國宮廷基於國家尊嚴的維護，不願派船前往中國，因為他們擔心官方行動會被解釋為法國國王臣服於中國皇帝的證據，國王的御船會被中國視為來朝的貢船。這番顧慮不無道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便評論，康熙肯定只把路易十四當作一位蠻夷國王，又遲遲不肯向他進貢，所以康熙皇帝只接受能為他提供服務的傳教士。¹⁰⁶

白晉的遊說看來就此失敗，所以他在《康熙皇帝傳》的最後刊登了一項聲明：「我們國家習慣懷疑從遙遠國家回來的人所說的話，這種不大有利的傾向讓我擔心，這篇以嚴格忠實筆法所寫的回憶錄將得不到應有的信任。但它只含有我們親眼所見的事物，因此我相信讀者將會公正地看待。」¹⁰⁷可見該書的出版可能是在他於法國宮廷的活動失利後，希望藉由傳播他在清宮的見聞，吸引其他群體的注意，因為他的遊說行動還沒結束，他現在的緊要任務是爭取到一艘直航中國

¹⁰¹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450.

¹⁰² Claudius Madrolle, *Les Premiers Voyages Français a la Chine: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 1698–1719. Ouvrage Orne de Cartes*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1901), p. 68.

¹⁰³ Ibid., p. 450.

¹⁰⁴ Collani, *Journal des voyages*, p. 26.

¹⁰⁵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450.

¹⁰⁶ Ibid.

¹⁰⁷ 白晉撰，馬緒祥譯：〈康熙帝傳〉，收入白晉著，春林、廣建編：《康熙帝傳》（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頁2；原文見於 Joachim Bouvet,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的最後部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號 8–O2N–250；中文翻譯將這段話放在序言。

的船隻。白晉的目光因此轉向法國東印度公司，他對公司董事們更加言之夸夸，大言中國皇帝准許法國在所有的港口設立商館。¹⁰⁸然此路亦不通，主因在於公司組織的運作模式不佳和資金短缺問題，法國東印度公司早在1664年6月8日獲路易十四特許而成立，但至此三十多年來從未派船前往中國貿易。法國東印度公司雖是科爾貝仿效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縮寫VOC)而創，期待從國際貿易中增加國家財富和透過殖民來擴張國土，但其體制與荷、英等以商人組建的東印度公司不同，是由政府所主導而如同王室的附屬機構，國王作為最大股東且其董事亦皆為王室貴族，¹⁰⁹因此他們的立場與法國宮廷一致，同樣質疑白晉的說詞，未被他說服前往中國商貿。此外，也因為法國東印度公司不是單純的商業機構，需要為國家政權服務，政治使命遠大於其經濟職能，使得它無法以商業盈利為主要考量而始終經營不善，經歷了多次破產和重組、重建，Jules Sottas (1866–1945) 即批評十七世紀這個階段的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失敗在於「政權專橫地介入公司事務」。¹¹⁰因此此時公司無力資助白晉的遠行，雖它曾在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助力下於暹羅活動，¹¹¹法國東印度公司當時觸及的範圍從未超越印度以東地區。

(二) 儒丹公司的出現

白晉至此又轉向私商求援，他在海軍大臣蓬查特蘭伯爵(Louis Phélypeaux, comte de Pontchartrain, 1643–1727)的引薦下結識了一位名叫儒丹(Jean Jourdan de Groucé，生卒年不詳)的富商。¹¹²這位商人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什麼記錄而顯得有些神秘，伯希和根據若干有關法國東印度公司和中國貿易的著作，做了一番整理和考察，

¹⁰⁸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451.

¹⁰⁹ Wellington,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ies*. 關於法國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貿易的最新研究，見 Susan E. Schopp, *Sino-French Trade at Canton, 1698–184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¹¹⁰ Sottas, *Une Escadre française aux Indes en 1690*, p.5, 9. 關於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分期和其各階段發展，見 Susan E. Schopp, "French Private Trade at Canton, 1698–1833," in 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 ed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3–63.

¹¹¹ 見本文注49。

¹¹²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451.

有些認為他是來自馬賽 (Marseilles) 的批發商、或是巴黎的香料批發商、還有說他是在巴黎做批發和玻璃製造的馬賽人，伯希和總結他可能是玻璃製造經銷商，因為「海后號」上裝載了大量玻璃。¹¹³ 儒丹對中國貿易很感興趣，又被白晉這些在港口設立法國商行、經由向康熙皇帝和顯貴們送禮可以免除所有關稅等動聽說詞所說動，而組建公司以派遣商船赴華。¹¹⁴ 但當時法國東印度公司持有遠東地區的貿易壟斷權，因此儒丹透過蓬查特蘭伯爵的斡旋向東印度公司購買到中國貿易的特許權，他為此和合夥人籌組一間公司，在1698年1月4日與東印度公司簽署12條協議，重點包括由東印度公司負責銷售從中國運回的商品，且獲取其販售利潤的5%；還規定該公司不可在航途中的任何港口和地區經商，船上需有兩名東印度公司的人員以做監督。¹¹⁵ 船隻方面，儒丹的公司向法國皇家海軍租借一艘軍艦，即「海后號」，船隻的配備則由儒丹公司負責。¹¹⁶

白晉和法國耶穌會士如此戮力要促成這次赴華之行，並想方設法要使其成為官方性質或帶有官方色彩，是同之前的傳教士一般，欲借法國的力量來維護在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的利益。從1690年代始他們與保教權耶穌會士之間的矛盾趨於白熱化，白晉便經常於信中向耶穌會總會長抱怨當時的中國副省會長葡萄牙會士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1645–1708) 對法國人很不友善。¹¹⁷ 兩者間的衝突持續激化，延續至整個十八世紀，法國國家圖書館有一份意大利遣使會士德理格 (T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 的報告，其中說：「1714年3月，法國耶穌會修士和葡國耶穌會修士大衝突。法人自言獨立，不受葡人管束，互相呈奏、互相攻擊。是年5月30日，(康熙) 皇帝親手降諭，命相處為安，如一身一家。」¹¹⁸ 故白晉等迫切地要將法國政府拉進其陣營中，然路易十四和其大臣並未隨之起舞，他們敏銳地察覺康熙皇帝的態度不似白晉所宣稱的那般熱切，所以法國漢學家

¹¹³ Paul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deuxième article)," *Journal des Savants* (Mars 1929): 110–12.

¹¹⁴ Paul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troisième article)," *Journal des Savants* (Juin 1929): 265.

¹¹⁵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deuxième article)," 114–15.

¹¹⁶ Jean Boudriot,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Frigate 1650–1850*, trans. David H. Roberts (East Sussex, UK: Jean Boudriot Publications, 1993), p. 398.

¹¹⁷ Wit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p. 65.

¹¹⁸ 閻宗臨：〈清初葡法西士之內訌〉，收入閻守誠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177。

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 便說：「路易十四不肯違背法國國王從不向中國遣使的習慣，以不損自己的尊嚴。」¹¹⁹由此來看，法國宮廷應也不將前次「國王數學家」赴華一事視作對中國的正式外交行動，故將其附於法國赴暹羅使團之行中。

法國耶穌會士積極向法國政府求助、期盼中法通商的另一大原因，在於解決他們入華的交通問題。因為葡國保教權的阻擋和法國東印度公司體質虛弱而一直未有直航中國的船隻，白晉這趟返法航途輾轉，花費三年多才抵達；而其去程亦花了近兩年半才達中國，來回已近六年。當時直航若海況尚佳，則單趟需時六、七個月即可，因此白晉在《康熙皇帝傳》中直言：「一旦建立貿易關係，我們的商船將定期地把傳教士帶到遠東去。在上帝的保佑和陛下您的支持下，通過他們的工作，將每年帶回有無數中國人入教的好消息。」¹²⁰訊息和物品的順暢流通對他們的活動極為重要，所以當法船「海后號」來到中國後，張誠在1700年9月16日給父母的家書中便興奮地表示：「今後法國和中國的貿易將更加規律，那些在巴黎照顧我們事務的人，將不會再錯過給我們寄來所需物品了。」¹²¹

（三）法國宮廷對「海后號」的定位

白晉終於得償所願，爭取到直航中國的法船，得以帶著招募到的一批共14位法國耶穌會士和修士赴華，其中有10位與他一同搭乘「海后號」，他們分別是翟敬臣 (Charles Dolzé, 1663–1701)、南光國 (Louis Pernon, 1663–1702)、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利聖學 (Jean-Charles de Broissia, 1660–1704)、馬若瑟 (Joseph-Henrg-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5)、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顏理伯 (Philibert Geneix, 1665–1699)、衛嘉祿修士 (Charles de

¹¹⁹ “Louis XIV, qui ne pouvait qu'en être flatté, fit à plusieurs fois témoigner son estime à Khang-hi sans toutefois déroger à la coutume des rois de France de ne point envoyer d'ambassade à la Chine, pour ne pas compromettre leur dignité.”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p. 41.

¹²⁰ 白晉：〈康熙帝傳〉，頁54。

¹²¹ “désormais qu'il y-aura un commerce plus réglé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ceux qui ont soin de nos affaires a Paris ne manqueront pas de nous pourvoir de ce qui nous est necessaire.”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Cinq lettres inédites du P. Gerbillon, S. J., missionnaire français à Pe-king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ed. Henri Cordier (Leide: E. J. Brill, 1906), p. 30.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號8-O2N-1323。

Belleville, 1656-?)、孟正氣(Jean Domenge, 1666-1735)和卜納爵(Ignace-Gabriel Baborier, 1663-1727),¹²²還有一位意大利畫家聶雲龍(Giovanni Gherardini, 1655-1723),他是世俗人士是而非教士,¹²³他有撰記並出版這次赴華見聞。¹²⁴白晉顯然有意向清宮輸入大量法國耶穌會士,來與保教權耶穌會抗衡。¹²⁵

「海后號」的另一重要目的是開展與中國的商貿,故除此耶穌會士團外,還有若干不同的群體。伯希和對該船上的人員背景做了詳盡的考察,並分析他們彼此間的關係。¹²⁶路易十四於1698年2月8日向「海后號」的船長拉羅克騎士(Chevalier de la Roque, 生卒年不詳)頒發敕令,表示該船是獲得國王批准前往中國貿易。因海后號是租借自皇家海軍的軍艦而駐有海軍軍官團,包括拉羅克騎士在內共有11人,三位大副Geraldin、Salioz和François Froger de la Rigaudière,掌旗官Louis de La Grange-Chancel(亦記Louis de Chancel de Lagrange, 1678-1747),還有兩名二副和四位海軍軍官;一位跟著軍官團的成員François Froger(1676-ca.1715)寫下了這趟旅程的日誌,是研究這艘首次赴華的法船的重要史料之一。¹²⁷這些軍官身負國王交代的任務,路易十四在敕令中指示:

¹²² 白晉此次招募到的耶穌會士還有殷弘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傅聖澤(Jean-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樊繼訓(Pierre Frapperie, 1664-1703)和宋若翰(Jean-François Pélisson, 1657-1736?),他們被安排搭乘另外三艘船來華;其中樊繼訓為具有醫學和藥劑專業的修士,明顯是白晉應康熙皇帝對法國醫學知識的求取而徵募。孟正氣和卜納爵原本與殷弘緒同船,後來他們與「海后號」在好望角相遇,白晉便安排兩人與之同船,故包括白晉在內,搭乘「海后號」至中國的耶穌會士共有11人。參魏若望著,吳莉葦譯:《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82;費賴之(Loui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73-74。

¹²³ 陳國棟:〈史景遷與康熙皇帝的「自傳」〉,收入葉高樹編:《歷史:經典導讀》(臺北:五南出版社,2019年),頁22。

¹²⁴ Giovanni Gherardini,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la Chine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en l'Année 1698* (Paris: Nicolas Pepie, 1700).

¹²⁵ 柯蘭霓:《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頁28-29。

¹²⁶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deuxième article)," 110-25; idem.,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52-67.

¹²⁷ 這份日誌首先是由英國律師Saxe Bannister(1790-1877)於1859年在倫敦編譯出版,但當時不知該日誌的作者是誰;其法文原版直到1901才由法國探險家Claudius Madrolle(1870-1949)出版,不過是節本;1926年對東亞藝術和歷史文化深感興趣的德國外交家Ernst Arthur Voretzsch(1868-1965)根據藏於里斯本阿茹達圖書館

[下轉頁96]

你們應細心認識所過中國海岸線之各處，毋有遺漏，……如為可能，並應搜集該國之埠口、碇泊所及海岸之地圖和中國人之航海記錄，於返國時立奏於我。……應打聽該國如何與亞洲及歐洲諸國家貿易，以便於返國時作精確之記錄，以為將來對該國貿易之準繩。……又於中國各埠口停泊時依各當地之風俗習慣應若何行動，亦應探聽，以免將來船舶至其地發生任何錯誤或與總督、官憲、或其他當地當局發生意外之事。¹²⁸

儒丹公司的15名人員則有包括第一商務經理Benac在內的三位經理，他在廣州活動時被稱作「貝老爺」(Pe lao-ye)；¹²⁹一位名叫Georges Francia的管貨人(supercargo，亦稱「貨監」)，¹³⁰白晉幫他取了一中文名「方儒法」(Fang Jeou-fa)，以跟粵海關官員打交道；¹³¹此外還有一位秘書、兩名文書和八位玻璃匠人。¹³²伯希和根據Froger的遊記中發現，這位首席經理Benac與船長的關係從在航途時就相當緊張，兩者爭奪此次商貿兼外交活動的主導權，使其衝突在廣州停留時期更加激烈；白晉和耶穌會士團亦因對「海后號」的定位與Benac主張的商業性質相左，而聯手船長反對他，且這位經理的性格似頗乖張而不受大部分船員所喜。¹³³兩位法國東印度公司的隨船監督員則似乎受到儒丹公司的壓制，無法參與任何商業活動，且他們認為儒丹公司侵犯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而與之不諧。¹³⁴

「海后號」便載著這些各有盤算的不同群體，於1698年3月6日從拉羅謝爾港(La Rochelle)啟航，其原欲駛往寧波，但因季風問題而轉往廣州，終於同年11月2日抵達黃埔港，這是法國船首次來到中國。¹³⁵這艘載有官、商、教士的船隻究竟該如何定位？路易十四在其敕令中有言明：「要按照英國人和荷蘭人

〔上接頁95〕

(Biblioteca do Palácio da Ajuda)的法文手稿在萊比錫出版了相對完整的法文版*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Asia Major, 1926)，他從手稿的署名才得知作者是François Froger，首頁有一篇獻給蓬查特蘭伯爵的獻詞。見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436.

¹²⁸ 張雁深：《中法外交關係史考》（北京：史哲研究社，1950年），頁73-74。

¹²⁹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53.

¹³⁰ 關於這些商人的稱謂，見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0-11。

¹³¹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55.

¹³²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2.

¹³³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53-54.

¹³⁴ Ibid., 259-60.

¹³⁵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 86.

(東印度公司)的作法一樣，宣稱他(拉羅克騎士)指揮的船不是國王的御船(vaisseau d'honneur)，而是一艘普通的商船。以便當今後時機成熟時，國王向中國派遣御船時，這次航行不會對它造成消極的影響。」¹³⁶看來路易十四再度強調了他尚無意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往來關係，且可能為白晉的種種積極行動和其所表露的強烈意圖所警惕，故他刻意在敕令中言明此次赴華的目的和性質。但白晉顯然另有打算，他雖未能說服路易十四和其大臣派遣正式的官船，卻從未放棄他原本的計畫，在回到中國後再次進行另一波的遊說行動，機關用盡要將「海后號」操作成受法王派遣的官方送禮使團，施展兩面手法建立他理想中的中法外交關係。

四、法船「海后號」來華： 白晉和法國耶穌會對中國海洋外交體制的挑戰

白晉在11月5日以欽差的身份，¹³⁷帶著船上的耶穌會士團到達廣州拜會主要官員，Froger形容這些神父們穿著法衣，甚至還將頭剃得跟中國人一樣！¹³⁸在「國王數學家」一行人抵達中國寧波後，洪若寫回法國的第一封信，是1687年8月12日致耶穌會法國教區代表Antoine Verjus神父(1632–1706)，報告他們終於來到中國的情況和激動之情，信中對當時傳教士入華前的妝髮整理有更直接的描述，洪若在信中提到在他們抵達寧波港的幾天前：「已經按韃靼人的方式理了髮，並脫去耶穌會的服裝，而按中國人的服飾裝扮。」¹³⁹看來這些意欲在中國

¹³⁶ “Il se conformera a ce que font les Anglois et les hollandois, observant en ce cas de declarer que le vaü qui commande n'est point un vaü de sa Maté mais un simple marchand, afin que ce qui fera en cette occasion ne puisse pas estre tiré a conséquence pour l'adeunir, s'il conuient par la suite a sa Maté d'y enuoyer de ses vx.” See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deuxième article),” 117.

¹³⁷ 意大利畫家聶雲龍在他的遊記中提到，在他們乘坐小艇前往廣州時，「小艇懸掛兩個大燈籠照明，燈籠上書『欽差』二字。」參 Gherardini,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la Chine*, pp. 54–55.

¹³⁸ 原文為 “They were habited, their heads were shaven like Chinese.” 見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23.

¹³⁹ 這封信由二十世紀初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裴化行 (Henri Bernard-Maitre, 1889–1975) 發表於《震旦學報》，見 Henri Bernard-Maitre, “Le voyage du père de Fontenay au Siam et à la Chine, 1685–1687, d'après des lettres inédites,” *Bulletin de l'Universite l'Aurore* III.2 (1942): 275–79；中譯文見呂穎：《法國「國王數學家」與中西文化交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343–48。

長久活動的歐洲傳教士們，在即將抵達中國前，會在船上從當時滿人規定一般剃髮編辮，並換上中式服裝，可能是為博得中國官方的好感而改變儀容，以減少他們在中國境內活動的阻力，並更易為當地人所接受。

回到「海后號」，白晉等向官員們聲稱此船是法國國王的皇家軍艦，是受法王諭令將他們送來中國。¹⁴⁰ 白晉此舉顯然早已和船長拉羅克騎士達成共識，10月31日在「海后號」尚未進到黃埔而停泊在虎門時，船長宣告之後要聲明該船是屬於法國國王的御船，若有違此令將以違抗國王御命論處。¹⁴¹ 那位與他們關係不睦的儒丹公司首席經理 Benac 即抱怨，白晉要求所有船員簽署一份中文文件，狡稱「海后號」是路易十四的御船，而船上的商人不過是隨之來貿易的客商。¹⁴²

這份文件應該是白晉計劃要呈給中國政府的一種證明，他看來是要對法王的敕令陽奉陰違，將此行形塑成某種正式的官方特使團，再搭配其作為康熙皇帝的欽差身份，以為「海后號」爭取特殊待遇，尤其是免除一般商船的所有稅目。所以白晉從抵達中國開始便大展欽差派頭，充分利用其身份，不僅是為了在中國官場行走方便，很大程度也是要展示給「海后號」上的各群體看，證明其所言非虛並製造後續效應。當「海后號」仍停泊在虎門時，該地的海關官員向其徵收「規禮」（外國商船進出港口和辦理各商務時給海關成員的小費），¹⁴³ 白晉對此相當震怒，因為他早已先與粵海關監督打過招呼，¹⁴⁴ 後者承諾將不會對其收取任何禮銀；¹⁴⁵ 白晉因此詰問該官員知不知道他的對話對象是誰，並以欽差的身份將他嚴厲地訓斥一番，還差點將他杖責。¹⁴⁶ 白晉確實將官威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廣州

¹⁴⁰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5;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26.

¹⁴¹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16.

¹⁴²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4–65.

¹⁴³ 清代外國商船來華時，基本上需要繳交三大類稅項：規禮、船鈔和貨稅。規禮即是給廣州各有關官員、胥吏送禮；船鈔是按船隻大小和規模來收取，故外國商人稱為丈量費；貨稅則按所帶貨物的價值來抽取成數。詳參陳國棟：〈粵海關的稅務行政〉，《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頁66–114。

¹⁴⁴ 在「海后號」10月初抵達廣東外海時，白晉先行去廣州打點一切，告知他這位「欽差」的歸來和法船的到來，粵海關監督派出引水人，並保證「海后號」在通過所有關口時不會受到檢查、亦不會被要求繳交禮銀。白晉得此保證後，帶著引水再回到船上領其入黃埔。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p. 96–105.

¹⁴⁵ Ibid., pp. 115–16.

¹⁴⁶ Ibid.

行走時也頗受禮遇，聶雲龍的遊記中便提到，他們在廣州的下榻處是專門接待高官和欽差的地方，且所有花費都由官府負擔；白晉神父外出時還有專人隨行，來符合他欽差的身份。¹⁴⁷

白晉的意圖至此已顯露無遺，他要將「海后號」塑造成法國政府的官船，而且還要挑戰「廣州貿易體制」和中國對西方的外交模式。¹⁴⁸他把本應是自己和法國耶穌會士團順道搭乘的商貿性船隻，顛倒成專門護送他們來華的法王御船，他也可因此成為法國國王的「欽差」，而船上的法國皇家海軍團和該艘租借自軍方的船艦亦有利於白晉的詭策。既然白晉賦予「海后號」官方性質，聲稱法國商人只是附屬此行藉機來華貿易而否定其原本的商業主調，他因此要求廣東當局免除「海后號」的船鈔和貨稅，加上前面已被免去的規禮，也就是全免稅的待遇請求。¹⁴⁹所以白晉對廣東大員們強調，「海后號」不是商船也非貢船，是法國國王的御船。¹⁵⁰因為他很清楚當時中國對外國船隻的認定只有兩種，不是商船，就是貢船，¹⁵¹是而他極力主張「海后號」是兩者皆非。白晉似乎要以首艘來華的法國船來創造某種特例，使之後前來中國的法國船隻和傳教士得以循此先例，暢通中法交通和往來。

（一）廣東各大員對體制衝撞的反應

但就如白晉自己所知，中國即使面對外國官方船隻來訪，也是統一以貢船視之，故白晉所設計的求取平等往來和優遇的「御船」方案，能否為中國政府所買賬？有趣的是，幾位廣東大員和康熙皇帝各有不同的立場。梅謙立 (Thierry Meynard) 的研究指出，當時的兩廣總督石琳 (1639?–1702) 似乎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他對法國耶穌會士友好且彼此關係密切，很大部分可能與石琳家族跟清室皇族的

¹⁴⁷ Gherardini,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la Chine*, p. 55.

¹⁴⁸ 過去多認為廣州貿易體制是乾隆皇帝限制一口通商後才開始，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從廣州各商貿群體間的互動中發現，該貿易機制於十八世紀初即已成形。陳國棟認為廣州貿易系統其實更早在 1684 年已現形，該年康熙皇帝設立粵海關，且其與中國行商、西洋商人的交往都已有一定的型態。詳參范岱克著，江滢河、黃超譯：《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 (1700–18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

¹⁴⁹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5.

¹⁵⁰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p. 109–10.

¹⁵¹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4.

親密關係有關。¹⁵²其兄石華善(?-1695)的孫女石氏(?-1718)為皇太子胤礽(1674-1725)的嫡妻，被冊封為太子妃(1695-1701；1709-1712)，¹⁵³石琳因此被法國人稱為胤礽的「舅舅」(oncle)。¹⁵⁴所以石琳對這幾位法國耶穌會士在宮廷的情況和跟康熙皇帝的特殊關係應該有所了解，故樂意與其交往，胤礽也和這些「數學家」頗有往來。¹⁵⁵這位總督幫助法國耶穌會在廣州修建教堂和於上川島改建沙勿略(San 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的墓地；且他與白晉親近，白晉於1693年以康熙欽差身份準備返法時，在廣州等待船隻的四個多月期間，石琳對其多有款待，¹⁵⁶兩者應有一定的交情。而白晉跟著「海后號」回到中國後，也是由他接待，因此白晉在寫給拉雪茲神父的信中便說：「我順利地找到了總督，……由於我與這位官員很熟，因此從他和巡撫那裡為拉羅克騎士及其下屬弄了一所公館。」¹⁵⁷石琳也同樣透過白晉與康熙皇帝的特殊關係來謀求家族利益，白晉在離開廣州後寫給利聖學的一封信提到，石琳的姪子請求白晉向皇帝推薦他，白晉同意並指出因為總督的幫忙，使法國耶穌會和「海后號」在廣州受到優待，¹⁵⁸此顯為白晉投桃報李之舉。石琳接受了白晉所送的儒丹公司準備的禮物，並轉呈給康熙皇帝，總督也回送了一批包括瓷器、絲綢、絹畫、漆盒等中國物品給白晉等。¹⁵⁹法國耶穌會透過他的協助，讓「海后號」免於接受界定船隻大小等

¹⁵²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學術研究》2020年第4期，頁112-25。關於石琳的背景，見趙爾巽等：〈列傳六十三〉，《清史稿》（上海：聯合書店，1942年），下冊，頁1126。

¹⁵³ 石氏是清代唯一一位正式冊封的太子妃；參趙爾巽等：〈列傳七〉，《清史稿》，下冊，頁1002。

¹⁵⁴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14。

¹⁵⁵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287-88。

¹⁵⁶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14-17；洪若亦在信中提到，他每到廣東時都受到石琳的款待：「他還是法國人的朋友，他對於法國人始終以特殊的禮遇和敬意來對待。」見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286。此外，關於白晉從北京出發後到廣州的旅程記錄，參Joachim Bouvet, "The Journey of Joachim Bouvet, Jesuit, from Pe-king to Kanton When Sent by the Emperor Kang-hi into Europe, in 1693," in John Lust, 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Warren: Floating World Editions, 2006), pp. 540-45.

¹⁵⁷ 白晉所指的公館即是專門接待欽差或高官的地方，與他自己所待處所等級相同。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145-46。

¹⁵⁸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17。

¹⁵⁹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25.

級的丈量，因此白晉在信中道：「我從總督和海關總管處獲准，……不必繳納任何稅款，甚至可免繳計量費和錨地費。」¹⁶⁰但實際船鈔的免除是等到1699年1月26日三位欽差帶來康熙皇帝的批准才確定，三位欽差分別是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1645–1708)、¹⁶¹「數學家」之一的劉應和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José Soares, 1656–1736)，他們受命來到廣州迎接白晉等。¹⁶²

白晉和儒丹公司也同時送禮給廣東糧道、巡撫和粵海關監督，糧道接受了法國人的禮物。當時的廣東糧道應是直隸舉人出身的張天覺(生卒年不詳)，¹⁶³ Froger表示他也是白晉的好友，¹⁶⁴可能亦願意成全法國耶穌會的御船論，並於免稅問題上為其出力。但是粵海關監督和廣東巡撫在等待朝廷對於「海后號」的認定結論，直到康熙皇帝授意其為貢船或商船的論旨到達前，他們拒絕接受任何禮物。¹⁶⁵

當時的粵海關監督黑申(生卒年不詳)應是把「海后號」視為商船，¹⁶⁶且免稅要求對其利益有損而不樂見。他對於白晉等的堅持甚感不解和訝異，無法理解為何法國人要提出這種不存在於中國認知的「御船」主張，¹⁶⁷所以Froger在他的記錄中提到監督多次追問白晉：「這到底是商船還是貢船？是否類似暹羅和越南那種帶來國王貢品的船隻？若是商船來到中國而不交稅，這是匪夷所思的。」¹⁶⁸

¹⁶⁰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145。關於關稅稅種，見本文注143；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20。

¹⁶¹ 陳國棟：〈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人物〉，《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年)，頁87–134。

¹⁶²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146。

¹⁶³ 郝玉麟纂修：〈職官志四〉，《廣東通志》，收入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9，冊563，頁151。

¹⁶⁴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25.

¹⁶⁵ Ibid., pp. 125–26.

¹⁶⁶ 梅謙立指出粵海關監督為黑申，是漢人。但《清史稿》的記載他是滿洲鑲紅旗人，並曾於雍正七年(1729)三月襲三等子爵，後因事遭革除。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21；趙爾巽等：《清史稿》，上冊，頁706。

¹⁶⁷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5.

¹⁶⁸ “The Hoppo had been much puzzled about the marks of distinction and dignity demanded by Father Bouvet for the ship. The Chinese had never before received any strangers, except either merchant vessels, which are here daily, or vessels carrying tribute, lie the kings of Siam, Tonquin, and Cochin-China, who do homage to the Emperor once in three years.” cf.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p. 109–10; Original source see François Froger, *Relation du Première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pp. 70–71.

粵海關認為法國商人帶著大批商品來中國貿易卻要求免稅是不合理的，因此嚴禁廣州商人和「海后號」進行交易，¹⁶⁹以此施壓法國人申報商品和繳交貨稅。由此看來，康熙皇帝明確免除的稅目和程序應該只有不須丈量船隻的船鈔，因此監督堅持貿易商品必須報關。然而白晉和洪若在分別給拉雪茲神父的信中卻都興奮地提到，皇帝「還免除船上所有物品的稅收」和「免去了『昂菲特利特號』應當交納的費用，不管是商品稅還是測量費皆被免除。」¹⁷⁰他們何以有此認知：相信「海后號」透過法國耶穌會士的關係獲得了關稅全免的優惠待遇？這是由於儒丹公司在此事上的隱瞞所致的矛盾。在法國商人方面，因「海后號」不使禮銀使粵海關官員對其多有刁難，加上白晉對於商人是順道而來貿易的說法，使粵海關將他們作為貢船的隨船商人般對待，不甚友善。當1698年12月9日首席經理Benac前往粵海關衙署拜訪時，官員們表現傲慢，且倨坐不起迎，讓該經理十分憤怒。¹⁷¹法國商人應因此認識到白晉先前的免稅承諾不完全可靠、官船主張亦不大可行，故貨監方儒法於12月12日帶著貨品清單前往粵海關造冊，遵照和啟動外商到中國做生意的程序。¹⁷²法國商人並於隔年1月29日在沒有告知和諮詢白晉和法國耶穌會士團的情況下，交給粵海關監督黑申600兩銀，且他們在此之前已經送了價值300兩的財貨給監督，¹⁷³作為貨稅或賄禮。

儒丹公司未將此事透露予白晉等應是刻意為之，因為他們從白晉的種種操作中意識到，交稅或類似之舉可能會為其所阻擋。法國耶穌會的立場在於爭取和創設一種與中國往來的新方式，他們處心積慮謀求「海后號」的關稅全免優惠，主要是此乃成立「御船」公式中的必要條件，而非出於商業考量來求取利潤。他們甚至為求此御船名目和表面上的優遇不惜犧牲實利，梅謙立提到為了讓「海后號」免於丈量，胤初可能有所出力，因法國方面給了他5,400兩。¹⁷⁴但按同時期來華

¹⁶⁹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24, 133.

¹⁷⁰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146、298。

¹⁷¹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28.

¹⁷² 粵海關於12月15日發出執照，准許「海后號」卸貨，使其可將貨品放在廣州的貨倉中。但程序進展緩慢，直到1699年1月20日，監督才再發執照准許法國人在廣州貿易。但因為隨後三位欽差的到來，粵海關又將法國人的貨倉暫時關閉，欲等了解康熙皇帝的態度後才再開倉。之後又因三位欽差帶來康熙諭旨而忙於相應的後續安排，儒丹公司的商人直到3月2日才得以開始全面展開在廣州的貿易活動。參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p. 128–38.

¹⁷³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35.

¹⁷⁴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20。

貿易於1699年8月到達廣州的英船「麥士里菲爾德號」(Macclesfield)，其噸位和等級與「海后號」相類，¹⁷⁵經丈量後所需繳交的船鈔為1,200兩，¹⁷⁶此也應為「海后號」若以商船來訪所應付的丈量費。可見法國耶穌會為了將「海后號」操作成皇家船艦的性質，而不吝金錢與宮廷權貴和地方大員交涉，船隻的特殊待遇形式和其定位的重要性明顯凌駕於實質的商業利益。梅謙立認為胤礽對法國耶穌會和法國商人的幫助是法國人透過石琳與皇太子的姻親關係，在清宮中發揮影響力。¹⁷⁷然而更有可能的是經由白晉自己與胤礽的關係，因為他在回到中國宮廷後，康熙皇帝將他指派給皇太子作為翻譯和老師，¹⁷⁸故白晉和胤礽有師徒關係而可直接爭取他的支持。「海后號」之所以滯留廣州長達約15個月的時間，遠超過當時一般商船按季風航期停留的3–6個月，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伯希和所論，白晉在近一年的時間用盡心機、周旋於各路人馬，來作它既非商船亦非貢船而是御船的操弄，¹⁷⁹進而耽誤法國商人的貿易活動，使其錯過季風期而延遲返航，此種延誤會加重商務成本的負擔而自然對商業運作不利。所以伯希和進一步評論，白晉為了免除這些關稅，反而花了不少冤枉錢。¹⁸⁰

法國商人基於與法國耶穌會考量相左的商業立場，交付錢貨給粵海關並對此事秘而不宣，造成了法國耶穌會對該趟「海后號」稅目全免的錯誤認知，因此在他們的書信和相關檔案中都出現這樣貌似事實的陳述，¹⁸¹在研讀它們時需要小心這種誤以為真的錯認。此誤解對1701年洪若所帶領的「海后號」二航中國產生不小的後遺症，由於他對首航關稅情況的掌握不完全，以為首航獲得全免稅優遇，故洪若在二航延續白晉的御船方案，而同樣拒絕繳交船鈔和貨稅，由此所採取的後續行動惹惱了康熙皇帝，導致洪若最終在1702年被逐出宮廷並於隔年返法的

¹⁷⁵ 關於「海后號」的船隻規模，見Roberts,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Frigate 1650–1850*, p. 398.

¹⁷⁶ 粵海關監督予以優待而減免船鈔，故該船實際繳交的丈量費為480兩。馬士(H. B. Morse)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六五五—一八三四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卷，頁95–97。

¹⁷⁷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20。

¹⁷⁸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1970), p. 924.

¹⁷⁹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4.

¹⁸⁰ Ibid.

¹⁸¹ 見本文注160。

嚴重後果。¹⁸²而法國商人在廣州得知洪若失信於康熙皇帝後，為避免重蹈首航跟粵海關衝突致耽誤貿易及回航期的覆轍，他們即時繳交1,260兩的船鈔。¹⁸³關於「海后號」的第二次廣州之行，在此暫不深論，將另文討論。

廣東巡撫蕭永藻(1644–1729)則傾向將「海后號」以貢船論處，¹⁸⁴要求代表法王的海軍官員在康熙皇帝的欽差來到廣州時行謝恩禮，此基本上是中國官方的外交儀式。他同粵海關監督黑申一般持慎重態度，一開始拒收法國人的禮物，等到1699年1月底三位欽差來到廣州，確定康熙皇帝免除船鈔後，蕭永藻才於2月22日接受包括鏡子、小擺鐘和槍枝等部分物品，退回大部分的禮物。¹⁸⁵他在康熙諭旨抵達的幾日後，在2月5日邀請白晉和包括船長拉羅克騎士在內的五位海軍軍官到其府衙，設宴款待。¹⁸⁶然其主要目的是要求法國代表進行感謝皇帝免除船鈔的謝恩儀式，並要求需由船長來進行，¹⁸⁷這是朝貢船和貢使來到中國時必須舉行的會驗貢物儀式。¹⁸⁸雖然這裡並無查驗貢品的程序，此緣於白晉的另一操作，下將論及，但廣東巡撫此舉明顯是將「海后號」視作貢船來行事，該是因應白晉的免稅要求，此正為貢船所享的優惠。¹⁸⁹此時白晉又再度強調船長是法王的官員，所以必須以法國方式來致意而非中國的跪拜禮，巡撫對此並無堅持，¹⁹⁰看來他主要意在儀式的舉行而非其內容。

但儒丹公司的首席經理Benac對此相當不滿，他認為自己作為公司代表才是該船的主導者，應當參與巡撫的宴請，而再次向白晉發難，責其欺瞞他。¹⁹¹兩者的衝突再度爆發於給康熙皇帝送禮的問題上，Benac對於法國商人在白晉和法國耶穌會的御船主張下，致被當成順道而來的商業群體來對待早已多有怨言，故於

¹⁸² Bouvet de la Touche, "Journal du voyage à la Chine fait dans les années 1701–1703," in Madrolle, *Les Premiers Voyages Français a la Chine*, pp. 61–276.

¹⁸³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21。

¹⁸⁴ 趙爾巽等：〈列傳五十四〉，《清史稿》，下冊，頁1114。

¹⁸⁵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37.

¹⁸⁶ Ibid., pp. 135–36.

¹⁸⁷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146。

¹⁸⁸ 梁廷枏：〈粵道貢國說·會驗暹羅國貢物儀注〉，收入氏著，駱驛、劉驍校點：《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00–201。

¹⁸⁹ 「暹羅國進貢船壓艙貨物，如願在廣東地方貿易，照例免其收稅。」見同上注，頁180。關於清代朝貢貿易的研究，見王竹敏：〈清代中国に來航した暹羅国朝貢使節の待遇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卷6（2013年），頁541–53。

¹⁹⁰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頁146–47。

¹⁹¹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36.

欽差到來後著手安排進京事宜時，他便與白晉爭奪前往北京謁見康熙皇帝的送禮權。¹⁹²白晉當然不同意公司經理們前往宮廷，伯希和表示耶穌會士總是反對商人進入廣州以外的中國內部，因其輕視商人而認為他們會帶給中國人不良的印象。¹⁹³而另一力阻其入京的關鍵因素是，白晉擔心其所塑造的官方御船形象，將會被 Benac 等所揭穿，加上若由商人做代表進京送禮可能會讓清廷覺察「海后號」的真實性質，這也是法國耶穌會要極力避免的，¹⁹⁴因此最終仍是由法國耶穌會士帶著禮物於 2 月 25 日離開廣州北上拜見康熙皇帝。¹⁹⁵

（二）康熙皇帝的態度

康熙皇帝對於白晉的御船論似是採取折衷態度，根據 Froger 的描述，1 月 27 日，三位欽差抵達廣州後，皇帝表示他願意接受這些禮物，並密令官員以其名義接收。¹⁹⁶此訊息是由法國耶穌會士劉應所傳達，他也是三位欽差之一。¹⁹⁷看來他同時身負康熙皇帝的密旨，來回應白晉那些不尋常的懇求。¹⁹⁸所以康熙皇帝在公開的諭旨中不論及禮物的處理，¹⁹⁹且在巡撫府衙的謝恩儀式中沒有一般驗收貢物的環節，即是他於某種程度上允意白晉，可不將所呈方物成為貢品。因為一旦皇帝公開或以自己名義接受這些物品，它們就不可避免地會被視作貢品，所以康熙皇帝選擇秘密接受這批禮物，應是基於對白晉的寵信所開的特例。當時康熙皇帝正在進行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至五月十七日，1699 年 3 月 4 日–6 月 14 日），所以白晉等一行人轉往江蘇，白晉在信中提到他於常州拜見康熙，²⁰⁰因此當是 4 月 11 日（三月十二）康熙駐蹕常州府時接見。²⁰¹但因為禮物被留在

¹⁹²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36.

¹⁹³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56–57, 263–64.

¹⁹⁴ Ibid., 264.

¹⁹⁵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37.

¹⁹⁶ Ibid., pp. 134–35.

¹⁹⁷ Ibid.

¹⁹⁸ 白晉在抵達中國時即寫了一封長信給康熙皇帝，除了報告其行途見聞，他在信中應該有提出關於海后號的種種訴求。參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I》，頁 147。

¹⁹⁹ 同上注，頁 146。

²⁰⁰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 117。

²⁰¹ 徐尚定標點：《康熙起居注》（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年），冊 6，頁 165–66。

揚州，所以康熙皇帝於返程時的5月21日才在揚州觀賞這些物品，²⁰²白晉描述：「我們一到那裡（揚州）就把禮物整理得井井有條，……皇帝希望仔細欣賞，命人逐件拿給他看。……不過最感興趣的是法國王宮中的圖畫，尤其是國王肖像，皇帝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它。」²⁰³白晉刻意點出康熙皇帝對路易十四畫像的興趣，意在強調它們是法王送的禮物，但其實不完全如此，他分別在1697年8月30日於巴黎和10月15日於楓丹白露的書信中提到，這批禮物是路易十四資助他一萬法鎊去置辦而來，²⁰⁴所以應是白晉自己所挑選。而從華鐸（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描繪一間巴黎高級店鋪的圖像 *L'Enseigne de Gersaint* (1720–1) 可以看到，路易十四的肖像是當時流行的商品。²⁰⁵

康熙皇帝對「海后號」的看法，在其回應廣東巡撫蕭永藻的奏摺時更顯明晰：在南巡途中的三月十五日（4月14日），康熙接到蕭永藻奏聞：「傳郎西涯國使因免伊船稅恭請天恩。」²⁰⁶即向皇帝報告已舉行過感謝其恩賞免稅的謝恩儀式，且此處更能體現出當時巡撫將法國代表視為貢使。康熙皇帝指示：「此係彼等私來貿易，朕憐其遠彝賈人，命關津勿稅。此謝恩奏章並非特來納貢者，應還其疏，不必批發。」²⁰⁷由此看來康熙皇帝對白晉的一番說詞頗為買賬，接受他所謂的法國商人是隨船順道來中國進行貿易的說法，此應是否定「海后號」作為商船的性質。康熙還特意交代該船跟一般前來朝貢者不同，所以這件奏疏不用批發，避開官方記錄，這則成全了白晉極力避免那些禮物淪為貢品的努力。康熙皇帝此番表態是在見過白晉三日後，想來白晉在拜見他時應有再度提出其處心積慮想達成的御船方案及相關條件請求。該條記錄是筆者目前所見，清代官方檔案文獻中唯一論及與「海后號」相關的記載，其餘像是前述白晉的拜見和康熙皇帝收受及觀覽那些西洋禮物，都未有隻字片語，尤其白晉還是作為康熙皇帝的欽差出使、又將搭乘的法國船隻賦予官方性質，清政府卻不做記錄，可見康熙採取檯面下運作的手法來消損其中可能的貢船元素。因此當赫世亨將這些禮物按一般貢品

²⁰² 康熙皇帝於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駐蹕揚州府。徐尚定標點：《康熙起居注》，冊6，頁183–85。

²⁰³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I》，頁147–48。

²⁰⁴ 魏若望：《耶穌會士傳聖澤神甫傳》，頁81；張國剛：《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66。

²⁰⁵ 此圖見 Matthew Craske, *Art in Europe 1700–1830: A History of the Visual Arts in an Era of Unprecedented Urban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5.

²⁰⁶ 徐尚定標點：《康熙起居注》，冊6，頁167。

²⁰⁷ 同上注。

形式在揚州展示時，康熙有所怪責，²⁰⁸因從上面皇帝的指示可見他已應允了白晉不將其當做納貢之舉的請求。但是這並非表示康熙皇帝願意接受白晉的「御船說」，其低調行事同時也意味著康熙不願打破非商船即貢船的規矩，無意開先例來承認第三種性質的船隻，所以才以密令方式折衷清代當時的體制和白晉的請求。

由以上康熙皇帝和各廣東大員的反應來看，白晉欲透過送呈所謂路易十四的禮物來打造的御船計畫，似乎沒有成功。這些廣東官員各應其不同的立場，將「海后號」分別作為商船或貢船來處理，故白晉千方百計要促成的關稅全免條件亦未達成。但他確實透過自己與康熙皇帝、兩廣總督石琳和廣東糧道張天覺等的私人關係，為法國商人爭取到一定的優厚待遇。前述與「海后號」同時在廣州做生意的英船麥士里菲爾德號的商人便論道：「法國人有大的優勢，他們在此處的利益比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得多，因為他們派特使到朝廷去，還有很多耶穌會傳教士在各處；他們送給皇帝大量禮物；所有官員都受了禮，不會干涉他們。」²⁰⁹應該也是因為白晉的關係。法國商人還跟與其有私交的總督和糧道做生意，總督透過他的商人買下「海后號」上所有的玻璃。²¹⁰當時的廣東大吏都有自己商人來插足貿易，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提到那時的「總督商人」叫Shemea，因總督石琳為其後台而是「廣州最大商人」。²¹¹

但法國人在廣州的貿易活動並非一帆風順，在忙完迎送三位欽差和白晉等耶穌會士們北上的安排後，儒丹公司的商人得以開始專心進行商貿活動。²¹²然就如Froger所描述，貿易進展得非常緩慢，使法國商人們懷疑中國商人是有意拖延時間，為的是等法國人在季風將來臨而不得不返航時，只能將商品廉價出售。²¹³或許有此可能，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源於法國初來中國貿易，未知白銀最受中國市場青睞，而沒有像英船一般帶有足夠的現款，²¹⁴所以需要等到法商將所帶貨物銷售後，才有現銀來購買中國商品，此從以下情況可見：1699年12月24日總督商人將玻璃貨款五千兩付給Benac經理後，法國商人在31日裝載了四船貨物上

²⁰⁸ 梅謙立：〈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的廣州之行〉，頁115。

²⁰⁹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頁101。

²¹⁰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42.

²¹¹ 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頁96、110。

²¹² 見本文注172。

²¹³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 142.

²¹⁴ 1697年7月從倫敦出發前往中國的英船「納索號」(Nassau)，帶了4至5萬英鎊的資金，約為12至15萬兩。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頁94、99。

「海后號」，即在收到該現款後於幾日內努力購買大量中國物品。²¹⁵但總督和糧道確有拖欠法商貨款的情形，玻璃交易已於6月10日協議好，同時糧道亦購買了部分法國商品，然而到了10月11日他們都還未繳付貨款。²¹⁶直到12月底法商才從兩位官員處收到欠款，糧道甚至以50噸銅來抵賬。²¹⁷在交付玻璃貨款的同一天，石琳亦告諭法國人，康熙皇帝命「海后號」盡快返航、不可再拖延回程的時間，²¹⁸這艘首航中國的法船已在廣州停留了14個月，皇帝催促的壓力應是這兩位廣東大員趕緊付清貨款的原因。

Froger在記錄中表達了對Benac經理的不滿，認為貿易進展不佳乃因這位首席經理優柔寡斷，致商機多次延誤。²¹⁹此一方面可能確因法國商人首次與中國人做生意，不諳規矩而有所耽誤；但一方面亦可能出於Benac與船上的海軍官員們不睦，使隸屬於軍官團的Froger對其挑惕。Froger將航期延宕怪罪於這位不受歡迎的公司經理，可能同時藉此掩飾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海軍軍官團對貿易進展不佳亦有責任。上面提到路易十四對這些「海后號」上的法國皇家海軍軍官有交派明確的任務，搜集中國的各類情報，尤其是航海圖等的測繪，Froger和掌旗官La Grange-Chancel繪有若干廣東沿海的地圖，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和里斯本的阿茹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²²⁰這些海軍任務的執行和白晉利用「海后號」所進行的上述各種周旋活動，對法國商人的貿易活動皆有干擾，故應都對該船滯留廣州長達15個月負有一定的影響。最終「海后號」於1700年1月26日啟航回法，康熙皇帝對白晉此行的成果相當滿意，故再派洪若帶著回送給路易十四的禮物隨該船返法。「海后號」在8月3日抵達法國的路易士港(Port Louis)，法國東印度公司將船上載回的中國商品清單刊登在《風雅信使》當年的九月號刊，宣傳這批貨物將於下個月在南特港(Nantes)拍賣。²²¹這是法國首次從中國帶回商品在本地進行拍賣，故從10月4日開始連續幾天在

²¹⁵ Bannister,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pp. 149–50.

²¹⁶ Ibid., p. 142, 146.

²¹⁷ 糧道於12月31日將50噸銅交給Benac經理。Ibid., p. 150.

²¹⁸ Ibid., p. 149.

²¹⁹ Ibid., p. 150.

²²⁰ 關於這趟航程所繪的中國地圖，參楊迅凌：〈法船「安菲特利特號」遠航中國所繪華南沿海地圖初探(1698–1703)〉，《海洋史研究》第15輯(2020年)，頁133–64。

²²¹ “Cargaison des Vaisseaux nouvellement venu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Mercure Galant* (Septembre 1700): 205–13.

南特的拍賣會引起很大的轟動，其中包括八千多匹的各種布料、17箱瓷器、17箱漆器、43箱屏風和其他各類中國物品，²²²此次本地銷售非常成功，以至於其拍賣情況被畫在扇面上流通，²²³並成為當時流行的繪畫題材。此次中國商品的銷售為儒丹公司賺進50%的極高利潤，使公司向皇家海軍買下「海后號」，於隔年3月7日再以此船二航中國。²²⁴惜因種種因素，二航中國的貿易落入虧損，使公司在1704年又將「海后號」賣回給海軍，²²⁵關於該船二航和中國商品於法國的兩次銷售情況及其後續影響，將另文討論。

五、餘論

致力於亞洲傳教活動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曾自豪道：「傳教士推動了法國與東方諸國的貿易往來及首個東印度公司的創建。」²²⁶此言道盡了清代中法交往和貿易的形貌，尤其在法國首航中國的「海后號」的成行上更是清晰。來華耶穌會士在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東西兩大君王「神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已在許多中外學者中引起眾多分析和討論，其中不少是強調法王或其宮廷對中國物品的追求和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的強烈興趣，從而促使傳教士們成為中法交流的橋樑。然本文的論述欲呈現這些傳教士，特別是法國耶穌會士，才是兩者往來的推動者，甚至是操縱者。從國王數學家的派遣到其所牽動的「海后號」來華，法國耶穌會可說是此密不可分的連續進程的最大推力，白晉甚至在兩方宮廷交流中，大膽地採取兩頭欺瞞的方式來設計自己的理想御船方案。不論其成功與否，此足以顯現傳教士們才是積極進攻的主動方，而中國皇帝和法國國王基於其政治、宗教、經濟、國家安全等各種包袱，許多時候僅能處於守勢或被動回應。

²²² “Cargaison des Vaisseaux nouvellement venu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Mercure Galant* (Septembre 1700): 205–13.

²²³ 此扇面圖見薛啟善編：《洛港東帆：十八世紀中法海上絲路貿易港》（澳門：澳門博物館，2016年），頁95。

²²⁴ Erik Wilhelm Dahlgren,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maritimes entre la France et les côtes de l’océan Pacifique (commencement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09), p. 154.

²²⁵ Pelliot,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troisième article),” 267.

²²⁶ “Ce sont les missionnaires qui ont donné lieu au commerce que la France a entrepris dans les pays orientaux, et à formation de la première Compagnie des Indes, etc.” See Louis Langlès, *Observation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Angleterre et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Paris: De l’Imprimerie de Delance et Lesueur, 1805), pp. 36–37.

在十七世紀末開啟的中法交往和與之聯動的商貿行動，成為了十八世紀聯繫兩國的模式。法國耶穌會士仍是其中要角，其對中國的勤奮經營，包括他們所考察、搜集和送回國的各種中國資訊和物質材料，使得法國成為歐洲「中國熱」的重要引領者；其努力亦使法國耶穌會於乾隆時期（1736–1795）成為清宮中勢力最大的西洋傳教士，得以持續為法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商人謀求利益。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的版畫製作為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法國之所以贏得鐫刻銅版的承作權，實多虧法國耶穌會士的奔走。法國著名漢學家 Henri Cordier（1849–1925）從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的國務大臣 Henri Bertin（1720–1792）的回憶錄中找到一段法國被委託製作版畫的關鍵敘述：

（法國東）印度公司從來就沒有被選中負責製造這些雕刻品，這是事實。中國皇帝打算在歐洲雕刻那些表現征服厄魯特的畫，這個君主委託廣東的地方行政官收集這方面的信息：英國首先被試探，但是廣東傳教團的主要負責人 Le Febvre 神父，被他朋友中的一個官員引見給了地方行政官，這個法蘭西的堅決捍衛者說，藝術在法國培植得比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好，雕刻尤其發展到了完美的最高點。結果，在呈給皇帝的報告上，君主批覆了他的命令，他要反映自己偉大勝利的畫由返國歐洲的法國軍艦運到法國去。²²⁷

這位在廣東的法國神父即是法國耶穌會士鄧類斯（Louis-Joseph LeFebvre, 1706–1783 後），他於 1762 年任法國傳教區的總會長，1767 年起在廣州擔任司庫。²²⁸ 此處明確指出法國東印度公司本無勝算，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當時的廣州佔據貿易優勢，每年來到中國做生意的船隻也最多，所以他們首先受到廣東官員詢問。但是法國耶穌會再次憑藉其與當地大員的關係，為法國商人牽線，攔截了清宮版畫的承辦權，延續了初期會士們所建立的交往模式。

²²⁷ 柯蒂埃（Henri Cordier）著，唐玉清譯：《18 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頁 65。

²²⁸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頁 364–65。

徵引書目

一、專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王冰：《勤敏之士——南懷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

白晉 (Joachim Bouvet) 著，趙晨譯：《康熙皇帝》，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白晉著，春林、廣建編：《康熙帝傳》，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

伏爾泰 (Voltaire) 著，吳模信等譯：《路易十四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呂穎：《法國「國王數學家」與中西文化交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

李明 (Louis le Comte) 撰，郭強等譯：《中國近事報道 (1687–169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編，鄭德弟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 I、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珪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年。

柯蘭霓 (Claudia von Collani) 著，李岩譯：《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著，江滢河、黃超譯：《廣州貿易：中國沿海的生活與事業 (1700–18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徐尚定標點：《康熙起居注》，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

郝玉麟纂修：《廣東通志》，收入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冊563。

馬士 (H. B. Morse) 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一六三五一—一八三四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高華士 (Noël Golvers) 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

張國剛：《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張雁深：《中法外交關係史考》，北京：史哲研究社，1950年。

梁廷枏：《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陳明錄著，駱驛、劉驍校點：《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

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年。

——：《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費賴之 (Louis Pfister) 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

葉高樹編：《歷史：經典導讀》，臺北：五南出版社，2019年。

榮振華 (S. J. Joseph Dehergne) 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趙爾巽等：《清史稿》，上海：聯合書店，1942年。

劉俊餘等譯：《利瑪竇全集》，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

鄭聖沖：《天主教耶穌會》，臺中：光啟出版社，1962年。

黎子鵬編：《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年。

閻宗臨著，閻守誠編：《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藍莉 (Isabelle Landry-Deron) 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魏若望 (John W. Witek) 著，吳莉葦譯：《耶穌會士傳聖澤神甫傳：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 (Adrianus Dudink)、蒙曦 (Nathalie Monnet) 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年。

柯蒂埃 (Henri Cordier) 著，唐玉清譯：《18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博西耶爾夫人 (Yves de Thomaz de Bossière) 著，辛岩譯：《耶穌會士張誠：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五位數學家之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Alden, Dauril. *The Making of an Enterprise: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Portugal, Its Empire, and Beyond, 1540–17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oudriot, Je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Frigate 1650–1850*. Trans. David H. Roberts. East Sussex, UK: Jean Boudriot Publications, 1993.
- Bouvet, Joachim. *Journal des voyages*. Ed. Claudia von Collani.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5.
- .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Chez Estienne Michallet, 1697.
-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Catholic Church. *The Popes Threatning Letter to the French King*.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Brome, 1681.
- Dahlgren, Erik.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maritimes entre la France et les côtes de l'océan Pacifique (commencement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09.
- de Chantelauze, François Régis. *Le Père de la Chaize, confesseur de Louis XIV: 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 Lyon: Brun, 1859.
- Devine, W. *The Four Churches of Peking*. Londo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1930.
- Froger, Françoi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French Embassy to China 1698–1700*. Trans. Saxe Banni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 *Relation du Première Voyage des François à la Chine fai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Leipzig: Asia Major, 1926.
- Gatty, J. C. *Voyage de Siam du Père Bouvet*, Leiden: Brill, 1963.
- Gerbillon, Jean-François. *Cinq lettres inédites du P. Gerbillon, S. J., missionnaire français à Pe-king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Ed. Henri Cordier. Leide: E. J. Brill, 1906.
- Gherardini, Giovanni.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la Chine sur le Vaisseau l'Amphitrite, en l'Année 1698*. Paris: Nicolas Pepie, 1700.
- Golvers, Noël.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1688) and the Chinese Heave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stronomical Corpus, Its Diffusion and Reception in the European Republic of Letter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régoire, Henri. *Histoire des confesseurs des empereurs, des rois et d'autres princes*. Paris: Baudouin Frères, 1824.
- Guillon, Georges. *Le Père de la Chaize, confesseur de Louis XIV*. Paris: Beauchesne, 1959.

- Hertz, Solange trans. *Rhodes of Viet Nam: The Travels and Missions of Father Alexander de Rhodes in China and Other Kingdoms of the Orient*. Maryland: Newman Press, 1966.
- Hsia, Florence C. *Sojourners in a Strange Land: Jesuits and Their Scientific Miss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Hummel, Arthur W.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Ltd., 1970.
- Jami, Catherine.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17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Josson, Henri, and Léopold Willaert, eds.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23–1688),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Bruxelles: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1938.
- Langlès, Louis. *Observation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et commerciales de l'Angleterre et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Paris: De l'Imprimerie de Delance et Lesueur, 1805.
- Launay, Adrien, and Frédéric Mantiennne, eds. *Lettres de Monseigneur Pallu: Ecrites de 1654 à 1684*. Paris: Les Indes savants, 2008.
- Launay, Adrien. *Siam et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Tours: Alfred Mame et Fils, 1896.
- Madrolle, Claudius. *Les Premiers Voyages Français a la Chine: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 1698–1719*.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1932.
- Marin, Catherin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350 ans à la rencontre de l'Asie 1658–2008*. Paris: Karthala, 2010.
- Mungello, Davi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 Parry, John.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1450–1650*. London: Cardinal, 1973.
- Phan, Peter C. *Mission and Catechesis: Alexandre de Rhodes and Incultur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8.
- Pinot, Virgile.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 Paris: Paul Guethner, 1932.
- Rémusat, Abel.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 Rhode, Alexandre de.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 Paris: Julien, Lanier et Cie, 1854.

- Ricci, Matthew.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 Louis J. Gallagh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 Roman, Luke and Monica Roman. *Encyclopedia of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 Sargent, Arthur. *The Economic Policy of Colbert*.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899.
- Schiebinger, Londa.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chopp, Susan E. *Sino-French Trade at Canton, 1698–184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 Sebes, Joseph.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61.
- Smithies, Michael. *Mission Made Impossible: The Second French Embassy to Siam 1687*.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 Sottas, Jules. *Une Escadre française aux Indes en 1690,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royale des Indes Orientales 1664–1719*. Paris: Plon-Nourrit et Cie, 1905.
- Tachard, Guy.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ésuites envoyés par le Roi aux Indes et à la Chine*. Paris: Arnould Seneuze, 1686.
- Van Dyke, Paul A., and Susan E. Schopp, eds.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 Wellington, Donald C.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ies: 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Record of Trade*. Maryland: Hamilton Books, 2006.
- Witek, John W.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1665–1741)*.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

二、論文

- 王竹敏：〈清代中国に來航した暹羅国朝貢使節の待遇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卷6，2013年，頁541–53。
- 伍玉西、張若蘭：〈宗教利益至上：傳教史視野下的「安菲特利特號」首航中國若干問題考察〉，《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34–47。

- 別爾津 (Берзин) 著，陳遠峰譯：〈十七世紀下半葉法國殖民者在暹羅的活動〉，
《東南亞資料研究》1963年第2期，頁69–78。
- 李招瑩：〈十七、十八世紀法國旅遊札記描繪中國人物肖像傳統——從中國叢刊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791》插圖談起〉，《人社東華》
第12期，2016年（電子季刊無頁碼）。
- 梅謙立 (Thierry Meynard)：〈康熙年間兩廣總督石琳與法國船「安菲特利特號」
的廣州之行〉，《學術研究》2020年第4期，頁112–25。
- 郭麗娜、陳靜：〈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對天主教中國本土化的影響〉，《宗教學研究》
2006年第4期，頁128–34。
- 陳國棟：〈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活躍於「禮儀之爭」事件中的一位內務府
人物〉，《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年，頁87–134。
- 嵇若昕：〈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會〉，《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年，頁292–302。
- 楊迅凌：〈法船「安菲特利特號」遠航中國所繪華南沿海地圖初探（1698–
1703）〉，《海洋史研究》第15輯，2020年，頁133–64。
- 董少新：〈安文思、利類思、南懷仁致耶穌會諸神父，北京，1669年1月2日〉，
《古今論衡》第28期，2015年，頁144–62。
- 魏若望 (John W. Witek) 著，辛岩譯：〈消除誤解：薄賢士和他的《中國禮儀之爭
問題的說明》〉，《國際漢學》2011年第1期，頁185–206。
- 嚴錯、吳敏：〈貿易與宗教同行——以「安菲特里忒」號中國之行為中心〉，《法國
研究》2013年第3期，頁83–88。
- 蘇一揚 (Ivo Carneiro de Sousa) 著，張廷茂譯：〈耶穌會士羅歷山：第一個在澳門
的法國人〉，《文化雜誌》第93期，2014年冬季刊，頁82–102。
- Ames, Glenn. "Colbert's Indian Ocean Strategy of 1664–1674: A Reappraisal."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3 (1990): 536–59.
- Bernard-Maitre, Henri. "Le voyage du père de Fontenay au Siam et à la Chine, 1685–
1687, d'après des lettres inédites."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III.2 (1942):
275–79.
- Bouvet, Joachim. "The Journey of Joachim Bouvet, Jesuit, from Pe-king to Kanton
When Sent by the Emperor Kang-hi into Europe, in 1693." In John Lust, 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Warren: Floating World Editions,
2006, pp. 540–45.

- “Cargaison des Vaisseaux nouvellement venu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Mercurie Galant* (Septembre 1700): 205–13.
- “Extrait d’une Lettre tres-curieuse écrite de la Chine.” *Mercurie Galant* (Septembre 1681): 194–211.
- Foss, Theodore N. “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 1683–1692.” In Jerome Heyndrickx, ed.,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0, pp. 121–42.
- Jami, Catherine. “Pékin au début de la dynastie Qing: capitale des savoirs impériaux et relai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Pari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5.2 (2008): 43–69.
- Judge, H. G. “Church and State under Louis XIV.” *History* 45.155 (1960): 217–33.
- O’Brien, Louis. “The Huguenot Policy of Louis XIV and Pope Innocent XI.”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7.1 (1931): 29–42.
- Pelliot, Paul. “L’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 en Chine.” *Journal des Savants*, Décembre 1928: 433–51; Mars 1929: 110–25; Juin 1929: 252–67.
- Puente-Ballesteros, Beatriz. “Isidoro Lucci S.J. (1661–1719) and João Baptista Lima (1659–1733) at the Qing Court: The Physician, the Barber-surgeon, and the Padroado’s Interests in China.”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82.163 (2013): 165–216.
- Steinberger, Deborah. “*Le Mercure Galant* and Its Student Body: Donneau de Visé’s Inclusive Pedagogy.” *Cahiers du Dix-Septième* 17 (2016): 41–56.
- Strach, Walter J. “Constantine Phaulkon and Somdet Phra Narai: Dynamics of Court Politic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Siam.”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 2004.

被衝撞的廣州體制？ ——重估清代中法交往和貿易的濫觴

（提要）

周穎菁

清代廣州貿易是中外交流研究的一大議題，其中多以東印度公司主導性強的中英或中荷貿易為討論的焦點。然中國商品在西方市場所受到的歡迎，許多得益於十八世紀法國藝文、學術、宗教界等所吹起的「中國風」。中法貿易基於其低落的貿易量而少有論及，此與中國物品在法國市場所受到的追捧形成耐人尋味的對比。筆者以為這種情況或與法國宮廷、西洋傳教士、廣東地方大員和清廷的「廣州體制」(Canton system)等各方勢力的競逐有關，其尤其反映在中法貿易的首航「海后號」(L'Amphitrite)，該趟商貿活動可說是成就於法國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所操弄出的康熙皇帝(1654–1722)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的神交假象。

關鍵詞： 海后號 白晉 中法貿易 廣州體制(廣州體系)

Revisiting the Origins of Sino-French Contact and Its Potential Challenge to the Qing Government's Canton System

(Abstract)

CHOU Ying Ching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origins of Sino-French trade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which was a result of the purported gift exchange between the Kangxi Emperor (r. 1662–1722) and Louis XIV (r. 1643–1715).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xchange was just a false impression manipulated by the eminent French Jesuit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This manipulation led to the very first French commercial voyage of *L'Amphitrite* to China in 1698, which defied the Qing Court's Canton system. Its entire contex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between various parties, including the French court, European missionaries, the Qing court, and high-ranking Canton officials, each pursu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Canton trad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Sino-Western contacts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with the East India Company (EIC) and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OC) dominating the discussion. Although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France drove and led the wave of *chinoiserie* in the West, its role has often been omitted from this discussion due to its rather restricted trade with China and East Asia. By studying the context of the premier voyage of *L'Amphitrit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France developed its own unique approach to play an active and essential role in the Canton trade.

Keywords: *L'Amphitrite* Joachim Bouvet Sino-French trade the Canton system